

毛里和子教授访谈录（译稿）

时间：2008年4月18日（星期五） 10:00~12:00

采访者：川岛真（东京大学）

记录人：益尾知佐子（早稻田大学）

\*【】为记录人根据上下文添加部分。

川岛：【看着事先提供给毛里教授的采访提问表】在研究经历及教育方面，想请您谈谈您本人对日本、中国及世界学界的看法。今天，首先想请您谈谈研究方面的事情。我想，在进入教育话题之前，从学界这一话题切入会更容易展开一些。

提问 1

进入中国

毛里：的确如此。教育是另一个领域。

川岛：不一定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在谈各个时段的事情时，您可稍看一下是第几个提问就行了。

请您谈谈您决定从事中国研究的原委。是否是从加入市古（宙三）先生的研究班开始的？

毛里：不是的。我 1958 年 4 月考入御茶水女子大学。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学

提问 11

是否接触过

海外的中国

生就必须决定自己未来的研究领域，或东洋史或西洋史。由于学生无权选择任教老师，所以，如果决定学中国近代史，便自动被安排到了市古先生那里。现在也是如此，确实是从最初就要决定下来，虽然也有人中途换研究班，但基本上都是以这一

方式完成学业的。由此可以看出，我从高中时代便已经决定从事中国近代史研

究。其实，我曾希望考入法学部，将来成为一名律师，但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他们绝对不允许我这样做（笑），强令我去考英文系或家政系，不允许我考其他系。我母亲毕业于御茶水大学的前身——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由于我就读的是附属高中，自然便要考入御茶水大学的英文系或家政系，或是国文系。他们希望我将未来成为知识女性，做一个贤妻良母，除此之外一概不予考虑。因此，不得已的情况下我选择了妥协，我想如果选择历史，或许可以蒙混过关。总之，我想考法律系、当律师的理想遭到了挫折。因此我想如果选择历史系，便应选择与近代较为接近的部分。同时，由于高中时代的世界史老师非常优秀，深谙历史的奇妙之处，内容当然是欧洲史部分，于是我便决定选择学历史。我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受到当时的中国现状的影响。1956年至58年，中国不是出现了许多非常新的情况吗？换言之，当时日中两国尚未恢复外交关系，我们完全不清楚竹幕的后面究竟在做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正在进行着各种试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我阅读了《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华·斯诺著《The Red Star over China》，1937年第一版），便产生了想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想法，因为当今的中国是基于它而形成的。进入历史系非常顺利，但这没有任何计划性，因为是在梦想进入法律系受挫之后不得已的选择。

提问 12

受到欧美的社  
会科学（马克

川岛：您是在御茶水高中读的高中吗？

毛里：是的，高中在御茶水高中就读。

川岛：世界史老师叫什么名字？

毛里：野口老师。她是一位非常有人缘的老师，非常胜任御茶水大学附中的教育

工作。

川岛：是男性还是女性？

毛里：女性，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

## 提问 2

### 在校的学

川岛：当时学习东洋史时，现代史、共产党史不算是主修课吧。

毛里：是的，完全不属于主修课。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幸运。因为这在设有传统性东洋史科目的大学，例如东京大学里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情。该如何评价市古老师呢？他属于传统类型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认为辛亥革命不属于历史范畴的想法是具有批判性的。他研究的是太平天国到清末时期。从东大东洋史的角度看是非主流的，但从方法论看，他的研究属于重视传统的彻底的实证主义，而研究题目比较新。他自己也在进行挑战，认为该方法对理解现代史非常有益，但不用这一方法指导我们。所以嘛，我说自己是非常幸运的（笑）。

虽然计划如此，但大学时代比较繁忙，没有真正学到什么，而且几乎没有上课。这是因为当时掀起了安保运动。而且，我当时表现狂热，甚至担任过旨在大学内设立生活协同组合（工会）的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为什么会这样，即使现在也想不明白（笑）。看来还是精力过于旺盛，一心想做更多的事情，只是完全没有方向。之后被卷入安保斗争中，不去研究室和教室，而开始经常出入自治会或生活协同工会的办公室。就这样，度过了非常忙碌的 4 年（笑）。

川岛：从这一意义上说，您的大学时代真的是很忙碌呀（笑）。

毛里：是的。所以我对学生绝对不采取点名的方式。我说过，学生可以一次课也

不上，但前提条件是要阅读我的书，并掌握其内容，其他则无关紧要。这种做法或许有些不合时宜。

川岛：原来如此。您没怎么参与过 1960 年的安保斗争吧。

毛里：不，我曾参与过。我的政治学观点曾发表在学术会议杂志上。当然这并非来自美国政治学理论或马克斯·韦伯的书籍，而属于“实践政治学”（笑）。我经常去国会旁听安保问题的审议会议。

川岛：其中是否有出于对美国学界的某种对抗而着手研究中国的原因？

### 提问 3

#### 选择中国

毛里：我想基本没有吧。因为自己的思想尚未达到那样的高度。换言之，意识中不存在“中国属于美国的对抗势力，是红色之星”的概念。倒是对我冲击最大，令我早熟的，是对斯大林的批判。这一冲击非常之大，当时的大格局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吗？其中，一方阵营的顶梁柱倒下了。对于斯大林而言，虽然我们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维护其情面的必要，但这毕竟属于一场巨变呀。这一巨变发生在我进入研究生院之后。都立大学中所谓的左派老师居多。由于容易考取，我进入了都立大学。当时即使上课，（其内容）也会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例如田中正俊先生（讲授过集中讲义）等就是这样。但是，他们十分清楚，仅靠这些是无法解释所有问题的。田中老师虽然不是以意识形态划分历史，但其基本思维方式、价值观里却有着这类的思想。从意识形态层面诠释历史的老师非常之多。因此，批判斯大林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们也间接地受到了相应的影响。另外还有毛泽东因素。尤其在人民公社时期，我

刚好在读大学，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的新闻纪录片《密植》至今仍记忆犹新。影片是动员全民，宣传只有人民公社才能使农业生产出现如此伟大的局面的新闻纪录片。记得当时是到电影院看的这部电影，据说当时各地稻田都是“密植”再“密植”，甚至人躺倒上面，稻秧也不会被压倒。这一切都发生在现实中。他们在做着非常伟大的事情，但他们究竟在做一些什么呢？那一时期，中苏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总的来说，当时自己还年轻。怎么说呢？总之，掀起安保斗争的阶层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共产党，第二类是激进左派，第三类是民主派。如今较为客观地说，我当时的立场介于激进左派和民主派之间。我当时曾与很多同仁就中国和苏联意见相左究竟会对我国产生何种影响进行过交谈。其中，既有彻底成为中国派者，也有不是中国派者。我们对此尤为关注。确实存在受到斯大林批判的影响，被中国所吸引这样的侧面。中国正在做着苏联想要做但未做的、或与苏联不一样的事情。总之，由于自己年轻，在这样的环境下，大概是对当时的中国较为关心吧。

川岛：由于当时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的关心，所以就没将区域研究列入选择范围。加之来自家庭中父母的影响，最终便选择了历史领域中的现代史。情况是这样的吗？

毛里：是的，有这方面的原因。只是对我而言，人们可能会认为是因为我对历史感兴趣，但我自己觉得并不是很喜欢。我丈夫攻读的是历史学，我觉得他倒是非常具有历史学家的素质。我还是更喜欢研究当代。御茶水大学既没有政治学系，也没有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因此只能选择在历史系攻读现代史。自己没有认真计划过，应该说这条道路是自然出现的。

川岛：毕业论文呢？

毛里：毕业论文曾备受宇野重昭老师的赏识，是有关浙江财阀的内容，阐述了浙江财阀即所谓金融资本从浙江的钱庄斗争到转变为银行的过程，时间是 1927 年至 1929 年，正处在蒋介石政权通过与金融资本的政治组合，逐步稳定下来的时期。为了了解浙江财阀问题，我前去了东洋文库。至今仍记得那个来历蹊跷的东洋文库。啊，是东洋文化？那是用义和团赔偿金建起来的，你不记得，还是没听说过？

提问 4

川岛：现在的新办公楼建成之前吗？

题目

毛里：要更早。

川岛：曾在影集中见到过。

毛里：大概是位于御茶水大学的南侧吧。总之是在南侧，位于御茶水大学和拓殖大学之间。

川岛：是外务省的研修所吧。

毛里：是的，后来成了外务省的研修所。（门前）有很大的狮子。是用义和团的赔偿金建成的。

益尾：是东洋文化（研究所）吧？

毛里：对了，是东洋文化研究所。现在不是迁到了本乡（注：日本地名）了吗？

川岛：原来是隶属于外务省的研修所。现在东京大学文化研究所的狮子就是从那里搬过来的。

毛里：对了，东洋文化研究所里藏有研究浙江财阀所需的资料《银行周刊》。真是一应俱全，有了这些资料，研究什么问题都成。我尤其对金融资本和蒋介石政权的人脉关系感兴趣。我也调查了理事会成员的构成。。总之，我所感兴趣的并不是金融史或经济史，而是蒋介石政权的基础，为了解蒋介石新政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我才开始研究浙江财阀的。

川岛：您认为自己设定的题目是否有些偏离现代的关注范围？

毛里：我也不知自己为何选择这一题目（笑）。

川岛：从与经济相关的脉络方面看，其内容或许与现代也有着相通之处呢。

毛里：或许是这样的。当时的中国正统史学是极力否定蒋介石的。属于官僚和买办性质。陈伯达的所谓“四大家族论”是以 1927、28 年的蒋介石与浙江财阀的结合为出发点的。或许是掌握了这一情况，才对之进行抵制的。我感觉是这样的。

川岛：您是从对某一定论提出质疑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吗？

毛里：是的。总之有些怪异。

川岛：是指大家都认为应是如此，而自己却提出质疑的事情吗？

毛里：是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让人有点接受不了，这也是必然的。

川岛：您在大学时代从事过各种活动，匆匆忙忙上课，认真完成了毕业论文。大体情况如此吧。

毛里：是的，终日匆匆忙忙的。还有一次课也没有上过，却获得了学分的科目（笑）。真是忙碌的大学时代呀（笑）。但我觉得自己学到了真正的知识。从哪里说起呢？之后我开始学习政治学和政治史，即何谓政治的内容。换言之，是对这些某种可见的事物和现在可以看到的事物所持的怀疑观点。我认为自己对书中所讲的权力为恶等不甚明了的概念，有了直觉上的把握。

川岛：您是边实践某种政治学，边进行研究的呀。蒋介石的研究也是如此。既是政治，也是对之提出的质疑，属于权力基础，从可见部分及其内部情况进行分析，是具有连贯性的。

毛里：虽然毕业论文不是十分理想，但无论如何是要毕业的。

川岛：您是提交了毕业论文之后便进入研究生院的吗？

#### 提问 5

#### 担任教师职

#### 务或研究职

毛里：不是的。当时发生了激进左派的后安保斗争。其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方式，其一是完全脱离政治斗争，从事主流学问的研究。如青木昌彦先生等。他们属于激进左派中头脑灵活的一些人。虽然他们不是立即转变方向，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如西部先生或青木先生转向了主流经济学，即非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领域。所以，这些人中有很多人进入了研究生院。至于我么，当时曾思考过这样是否合适。由于自己生性不愿随大流，看到大家都升入了大学，我曾想过就职。虽然工作并不是轻



而易举能够到手的，但国际问题曾多次招聘过助手。对了，那之前我曾受亚洲经济研究所之聘做过调查，那是大学时代。亚洲经济研究所当时在四谷，办公室非常狭小。

川岛：市谷前面吗？

毛里：从市谷一直向前。记得是和位于四谷的上智（大学）并列的地方。后来我曾前去打探【消息】，说自己希望能够到那里工作。不像今天这样，有网页，可以下载（笑），求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是直接去的，希望能够就职。当问道“可以做些什么工作”时，对方回答说“女性将不被录用为研究人员。只能从事事务性工作”。我不由地气往上撞，便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另请高明吧。”由于发生在距今 40 多年、近 50 年前，与现今完全不同的时代。自己没怎么因为是女性而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那时却是实实在在地吃了闭门羹。对此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意外。不久国际问题研究所为编写资料集，招聘与中国有关的助手。他们来到了御茶水大学，问有没有谁愿意应聘。那里不是有山极晃先生和百濑宏先生吗？或许是受到当时御茶水大学讲师百濑宏先生的介绍，山极先生来到御茶水大学，询问有谁在攻读东洋史。当时其他人都非常优秀，所以都找到了接收单位。没有着落的只剩下了我。所以，我便表示自己希望前去工作。当时虽然不知将做些什么工作，但想到至少会领到工资，而且大概会与研究有关。

川岛：是在撰写论文之前吗？

毛里：是在毕业论文完成前后。记得得知最终被录用是在 12 月份。因为从 1 月份就已经开始上班了。当时不是全勤制，每周去两次。具体而言，当时外务省开

展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大型项目已经开始，由于资金已然到位，不能停止。因此对方要求能够尽早上班，我便于 1 月份报到，开始从事协助编辑的事务性工

#### 提问 6

#### 参加过那些

作。其间，我学到了各方面的知识。当时，山极先生和宇野先生在外务省的中国科工作，是阅历丰富的官员。在转职到成蹊大学之前，曾在外务省工作过。虽然在年轻时代进入了学界，但宇野先生认为，在外务省的调查部门编辑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经过自己的努力，他的预算获得了通过。那是一笔金额很大的预算。主要是宇野先生和加藤纮一先生争取的。记得加藤纮一先生是在其后最为严峻的时期出任了中国科科长。后来，外务省认为不需要再为这类研究提供帮助，并表示将取消财政拨款之时，加藤纮一先生极力争取，强调“外务省也必须支持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编写资料集。比如说，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国际，因此首先需要成立一个学习会。在分析现代中国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疑与共产国际有关。因此，宇野先生对共产国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文献在内，他为我们讲解了非常多的事情。从这一意义上讲，实际上给予我指导的是宇野先生和山极先生。我的学习是从那时开始的。

川岛：原来如此。听了您的讲解，我已经明白了。当时的学习会是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的研究会吗？

毛里：是的。属于内部研究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赶上了好年代。虽然清贫些，但却实行高度弹性工作制。由于不是那种一刀切的僵化作息时间体制，所以能够做很多事情。

川岛：经过 4 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毕业了？

毛里：是的，算是一个奇迹吧（笑）。市古先生大为惊奇，“你竟然获得了这么多学分啊”。御茶水大学西洋史系里有一位与众不同、非常有名的尾锅辉彦老师。他也说我“加藤（注释：毛里教授婚前父系姓氏），你很不得了呀，是如何取得这些学分的？”（笑）总之，我只是取得了学分，但成绩都不是很好。

川岛：哪儿的话？（笑）那么您离开校园后，从事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的编辑工作了多少年？

毛里：工作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20 世纪 20 年代后的中国共产党的资料集，另一种是现代中国的资料集。这就是《新中国资料集成》。当时是两个项目同时开展，因此工作非常繁忙。但是，日本国内当时没有全部的原始资料，包括《人民日报》。谈到中国共产党初创期的资料，倒是有《新青年》及《共产党》等。这些为共产党核心创始人物陈独秀所创办，日本不可能全部拥有。所有资料都依靠美国，尤其是胡佛研究所。胡佛研究所里有大量的苏联圈和中国方面的资料。有时会经台湾获得。胡佛研究所的资料数量非常庞大。

川岛：的确如此。那里的报纸藏品非常丰富，还有杂志。

毛里：那一时代基本上都是缩印本，因为还没有网络这种载体。所以，或购买缩印本，或是去书店购买书籍，负责人阅读后，认为需要便记录到清单中。这种工作非常辛苦。《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从 1921 年 创立前后至 1945 年共有 12 册。其后是《新中国资料集成》，跨度从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1958 年大跃进时期。这些完成之后，认为应该编辑有关大跃进后的资料集，于是又出版了 2 部《中国大跃进政策的展开》。这些都由后来一直是研究伙伴、执教于筑波大学

的安藤正士先生完成。由于对资料整理十分感兴趣，他就在这里完成了这一十分枯燥的工作。小岛丽逸先生非常热衷大跃进的研究，包括土法炼铁及农业等。大体是这种情况。因此，我与小岛丽逸合作，出版了 2 部《中国大跃进政策的展开》。国际问题研究所推出的《中国问题资料集》大约在 1962 年前出版，追踪了约半个世纪的中国。整个过程是在把全部原始资料列成表后，逐一进行确认，再召开选题会议和研究会议。因此，我们必须在阅读所有资料后，向研究会议提交报告。接下来，便开始决定所需部分。然后交给翻译，再对译稿进行两次审校。这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还能够领取虽然不是很多的工资，我感到非常幸福。

川岛：如此说来，通过大量阅读报纸，是否感觉大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数据库？

毛里：是的，已经形成了一个数据库。因此，虽然自己没有上过博士课程，但却有着绝不逊于他人的自信。总而言之，这是由于自己曾系统阅读过第一手原始资料。

川岛：我彻底明白了。

毛里：由于是从最早的《新青年》开始按顺序阅读的，所以，在对整体历史进程的理解方面，自己有着绝对不逊于任何人的自信。

川岛：的确，认真、系统阅读了某种资料后，就会生出自信，并能够按此标准进行分析。

毛里：还能够使人不犯较大的错误。

川岛：因此，能够从中发现问题并建起基础数据库。我自己一直在阅读外交文件，并形成固定的习惯，感觉自己系统阅读一个资料馆内的同类资料，从中找到了一种均衡感，例如“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或“这属于特例”等。迄今还有这样的感觉。

毛里：的确，这属于典型的经验主义，很难向他人解释清楚。

川岛：是一种感觉。我认为，与深入挖掘某一主题的人相比，在读过如此大量的资料后再进行思考，会更适应各种情况。

毛里：是的。因为人们无论研究什么都不会想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例如，研究完中国外交，再研究中国内政，或是从外围观察中国，我完全不会觉得是在做多余的工作。因为其中会有一条线。所以，我常常想，教育是否最好也转向这种形式。

川岛：你是指连续阅读归类资料吧。以前似乎田中老师等人很喜欢连贯地阅读历史或史实的。这样一来，清朝所发生的事件就会潜意识地存储在脑海里。滨下[武志]老师在其学生时代，曾帮助整理过香港·上海数据库的文件，好像那一期间他一直在读相关文件，那些已经占据了他的大脑。

毛里：总而言之，不能缺少这种财产，而且也不能带有随意性。从这点上讲，我自己也知道我现今的研究模式有很大问题。例如，不能完全、系统地阅读一部书，或由于没时间而无法就某一主题对多部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再者，对于重要会议记录，虽然迄今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整理，但还是把相关会议悉数纳入，而自己

也不做调研。只看些自己主观认为重要的会议内容。因此，我认为这其中有很大的问题。

川岛：没有做过跟踪研究，着眼点便会落在那些检索出来的相关资料。

毛里：的确如此。检索本身也存在着问题呀。

川岛：因为在不具备这些方便的手段之前必须全部阅读。自己在阅读中会发现各种问题，而且会在这一过程中打下基础。但我发现，最近人们只是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仅对单一问题进行研究，罗列出相关内容，且遗漏了这些问题在整个轴线上的定位。正如您所说，在教育方面，直接提出问题，要求学生阅读、多读，然后试着说出其中有意思的内容，这种做法或许更有意义。但现实中的做法却是大相径庭，人们首先提到的便是论文，博士论文也不例外。

毛里：是这样的。最近人们非常重视研究方法及学科，早稻田大学也是如此。例如，像统计方法一样，人们认为所谓的研究方法部分十分重要，在读硕士期间一定要掌握。这样一来，区域研究人员首先要掌握语言；其次要完全掌握涉及当地的历史、社会等各领域的杂学，虽然这与自己的论文不存在直接的联系。然而，由于时间所限，难以完全掌握。

川岛：完全如您所讲，这属于一种杂学。如果有过当地生活经历，并与当地人进行过接触便会自然掌握，但年轻的区域研究人员却没有这样做，我对此感到很惊讶。

毛里：再者，现在没人研究外交史，人才很难培养。以现有的环境培养研究外交

史的人才非常困难。首先是工作岗位少。由于外交史研究非常辛劳，已经进入了多语档案年代，所以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懂得语言。比如中国外交方面有关东德解体的内容，有可能在中国还没刊出时，在东德已经见诸媒体，因此很可能是以德语刊出的。这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国际化。其次，在研究外交时，必须进行紧密跟踪。这样一来，将会花费很多时间。然后，一定要尽可能地收集大量的外交文件，并认真研读。我觉得自己从事这种繁杂工作的时间似乎变得越来越少。

川岛：由于这些文件不可能轻易到手，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很多的时间，所以人们为了不去耗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便采取了逃避的方式。

毛里：是的，大家都避开了。因为在国际政治学会的理论领域，发表什么新新结构主义等的论文似乎看起来更有面子。

川岛：不但评价高，而且会给人一种聪明的感觉。但在教授会议上却很难通过，因为无论如何要接受理论方面的审查，常常会被问到“这一研究有何意义”（笑）。

毛里：是这样的。听到这里，我也很想知道你所从事研究有什么意义呀（笑）。

川岛：哈哈（笑）。我想，即便是被鸡蛋里挑骨头，我想自己也能够自圆其说吧（笑）。

#### 提问 9

您是如何

毛里和川岛

毛里：的确如此。如果从社会科学角度进行中国区域研究，需要

提供相应的标准。但是，如果超越这一水准，从区域研究的角度进行中国研究，则必须提高在其他研究中所不需要的技巧和能力。如何才能具备这种技巧和能力呢？

川岛：具体而言，是否从撰写学士毕业论文到进入国际问题研究所期间，您已经掌握了这种技巧了呢？

毛里：是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阅读史料。我想，宇野先生和山极先生等的指导恐怕要比研究生院的教育更有意义。因为现实中是面对史料展开讨论的。从必须作答这点讲，还是令人感到紧张的。卫藤（沈吉）先生和石川（忠雄）先生也参加了这一项目，因此，我们以两位先生为带头人，开展了研究活动。卫藤先生出席定期每月一次的研究会，那时他还年轻，大约不到 50 岁吧。

川岛：卫藤先生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既与江口朴郎交好，也与左派有着交往。

毛里：是的，那人叫尾崎正太郎。

川岛：他留有很多令人惊讶的访谈。

毛里：怎么说呢，他似乎最注重的是人品，以对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感受及人品去评价整个人。

川岛：是以人品，而非宗派主义评价一个人啊。您总共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了几年呢？



## 提问 2

左松

毛里：我一直工作到 1987 年，时间很长，大概有 20 多年吧。进研究所后，我便上了研究生院。由于当时自己渐渐意识到，应该重新学些新知识，因此便向山极先生提出请求，希望自己改成不坐班，无论如何也要让自己去研究生院学习。幸运的是，自己的申请得到了批准。我想以助手的身分到研究生院学习，但当时只有都立大学能够接受这种身份的学生，因为只有那里才有晚间授课，是昼夜授课的。上课不仅是白天去，晚上也去。东洋史很容易入门，因为即使没有学过，也能够想办法被录取。此后便一边到研究生院上课，一边在研究所工作。

川岛：当时的东京都立大学东洋史系里有哪几位老师？

毛里：东京都立大学的情况不是不好。有一位佐伯有一先生，他属于东洋文化专业。转到东洋文化专业后，佐伯先生改为了非专职老师。我曾上过几次佐伯先生的课。此后，进来了一位专职老师里井彦七郎先生。他所研究的领域应该是辛亥革命前后期吧。

川岛：是的，他研究辛亥革命。

毛里：重点是农民，从阶级史观角度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人，不过弄坏了自己的身体。东洋史的核心人物是旗田巍老师，研究朝鲜问题的。其后是矢泽先生，研究现代中国问题。全名是矢泽康祐。他当初曾写过很好的论文，当时他还是助手。之后调到专修大学。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他的研究领域由中国改成了朝鲜。大概有很多原因，或许也与旗田老师有关吧。

川岛：是吗？您是哪年进入研究生院的？

毛里：63年至65年。63年考入，65年毕业。由于有了研究生院学习的经历，通过考试后，获得了研究员资格。

川岛：硕士论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完成的？

提问 4

你是

如何

毛里：当时非常紧张，真的很忙，一直是忙得不亦乐乎（笑），几乎连写论文的时间都没有。因为还有工作在身。最终选择了北伐问题，是有关蒋介石政权之前的事情。谈到北伐问题，总而言之，如果按照北伐军出征并取得胜利这种框架来写，是不是没有什么意思？您知道武汉政府的情况吧？概而言之，是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临时合作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成立不久受挫。其核心人物是谁呢？其中有汪精卫。

川岛：还有胡汉民。那一期间显露头角的人都曾出现过吧。

毛里：总之，基本上属于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时期和国共合作末期。在蒋介石退出的过程中，剩下的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设立了武汉政府，只持续了半年多，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想，因为这一进程非常有意思，大概已经有人研究过。

川岛：是啊。这在外交史上也非常有意思，如武汉政府的各种宣言及有关武汉租界的各种谈判等。

毛里：是的。这怎么表述才好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在竭力开展革命外交，是所谓的革命外交。从事这种外交活动最多的是谁来着？

川岛：虽然汪精卫也参与其中，但当时是胡汉民及其身边的一些人在做。还有一个人，就是曾留著述……，书名是《武汉政府革命外交史》，但没有署名。就是这个人。

毛里：其中记述了北伐军取得的军事进展，国民党内部出现权力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鲍罗廷和陈独秀派的分裂等内容吧。也谈到武汉政府。当时正值各种思想出现分歧时期，其象征性事件是武汉政府的设立，用今天的话说，是政治“转折点”。

川岛：山田辰雄先生的中国国民党左派的论文就是这一时期的事情，石川先生所撰的有关训政期约法也是这一时期吧。由于当时正是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似乎都对北伐或国民党左派感兴趣，武汉政府相关内容的确曾是当时的焦点所在。但是，这些迄今仍无人研究。

毛里：的确没有人研究。如果自己继续研究历史，或许会研究下去。

川岛：使用了哪些资料呢？

毛里：准确地说是报纸，基本上查阅了所有的相关报纸。包括武汉和广东出版的报纸，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向导》等。这些是按日期顺序连续出版的刊物，我记得自己曾经见过。

川岛：广东有《广东日报》等，武汉也有各种报纸吗？

毛里：不是有《中央日报》吗？我曾读过许多《中央日报》。

川岛：啊，是国民党的党报。

毛里：然而，由于当时的确非常忙碌，所以论文也不是很令人满意。

川岛：我想起来了，刚才谈到的人是陈公博呀。

毛里：对，是陈公博。

川岛：有陈公博，还有陈友仁。

毛里：对，陈友仁（笑）。

川岛：陈友仁掌管外交，所以留下了著述。终于想起来了（笑）。对了，您的硕士论文公开发表了吗？

毛里：没有，由于受那一时代的影响。当时不存在硕士论文必须公开发表的压力，人们也没有这样的积极性。总之，当时还不具备成果必须发表的环境。

川岛：是的，您那时还没有这种环境。从我那一代起，突然被要求撰写博士论文，真让人吃惊非小呀（笑）。

毛里：当时也没有获取博士学位的制度，博士学位被称作傻瓜才要之物。

川岛：因此，最优秀的人大都大学毕业后便就业了（笑）。当时，东洋史系的优秀学生在其升入硕士前便被录用为助手了。由于刚好站在了这一分界线上，所以我们这一批人也就成了最早撰写博士论文的一代。跟我同期的同学有一半是属于前一代的（译者注：不写博士论文的一代）。

毛里：博士论文的压力大吗？

川岛：大概从我一到研究生院时开始的吧。由于当时正值 94、95 年。人们认为，老师当中还没有人获得博士学位，而你们却在攻读博士学位。大家最初都不相信，认为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就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一两个人真的取得了学位。但仍有一些人不相信。于是，与我同届的学生共有 6 人，其中突然就有两、三人因就任助手而停学，虽然剩下的人都被允许获取博士学位。我有幸最终获取了博士学位。90 年代中期开始的 10 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大都是到了您这样的年纪时，才会被要求撰写博士论文的吧。

毛里：是的。总而言之，博士学位是作为成果的象征而被授予的。

川岛：是呀，获得博士学位是在真正掌握了许多知识之后。而且，印象中，是在取得学士院会员等资格后，才能取得博士学位。

毛里：所以我也绝对没跟人说过一定要取得博士学位。总之，由于被要求取得博士学位，所以就拿到了，但没有对别人说过（笑）。

川岛：哈哈（笑）。那么，您是在都立大学研究生院学习 2 年，写完成硕士论文后，进入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

毛里：是的。

川岛：那么，您在就读都立研究生院期间，这一资料集还有没完成的部分吗？

毛里：是的，还留下一部分。有关资料集的工作，记得不是很清楚，到大跃进时

代，共编写了 3 种资料集。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资料集，是我必须做的。一直到第 8 卷，我几乎全文阅读过，而且读了 3 遍。从第 9 卷开始，新来的姬田光义先生（后来中央大学）及后来调到静冈大学的今井骏等人加入进来，在很大程度上，今井等人在有关新四军内容的卷本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最终，全部项目完成一直延续到了 70 年代中期。虽然时间很长，但都得以出版发行了。外务省、国际问题研究所及出版社劲草书房都做了很多工作。花费了很多资金，也占用了很多的时间和劳力。在当今的时代很难想象。

川岛：您没想到过把资料集的工作和硕士论文联系起来吗？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吧。

毛里：是的。

川岛：哦，那么您回到研究所后，基本上也是以编辑资料集的工作为主吧。

毛里：是的，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初期。然后也曾被指派做过很多事情，如新项目的设立以及《国际年报》的编辑等。由于涉及全球范围，全都是自己制定编辑方针，受益匪浅。例如，虽然古巴危机已在很久之前结束了，但对第四次中东战争、尼克松冲击等事件必须全部进行研究，所以有了很多的知识积累。

川岛：当时您在学会上发表过论文吗？

毛里：我属于与学会无缘的人。

提问 6

您隶属何

种学会、

川岛：是呀。在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事这样的工作，便不会在学会

上做些什么了。

毛里：唯一的一次学会发表是在亚洲政经学会上。不过，当时的亚洲政经学会名声不是很好，被普遍认为是属于与国际政治学会有着极大区别的类型。我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我在亚洲政经学会上做了有关“查田运动”的报告。你一定知道30年代发生在苏维埃区的“查田运动”吧。我曾使用过“红色中华”等字眼。报告中使用了资料集中的全部资料，非常有意思。由于论文写得很有趣，便在学会上发表了。所谓“查田运动”，在传统历史中被认为取得了成功，实际上，那一期间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政治事件。我想自己大概谈到过一些与典型政治事件相关的内容。

提问 10  
您如何评价日本各

川岛：当时我也在东洋史部门，那时加入亚洲政经学会让人感到很犹豫。我是在就职之后加入亚洲政经学会的。加入国际政治学会比较容易，但加入亚洲政经学会则门槛高出许多。如果对现在的研究生提起这件事，大概不会有人理解吧（笑）。

毛里：嗯，恐怕完全不理解。当时的学会首先是被实力派老师控制，其次是看上去与政府关系密切。但现在已经完全不是那样的时代了。当时不是有一位村松祐次老师吗？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老师吧。

川岛：谈起社会经济史的村松先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呀。

毛里：真希望他留有更多的著述。

川岛：是呀。

毛里：接下来是东大从事外交研究的坂野【正高】。这些人都是非常优秀的中国研究学者。我还受到过松村先生的表扬呢，因为那篇非常有趣的报告。

川岛：喜欢松村先生著作的人如今仍大有人在。即使是在今天，他的著述读起来也会让人感到震撼。虽然近年的研究生也许已经不读他的著作了。那么，您在文革期间呢？

提问 16  
您当时是  
如何评价

毛里：文革期间一直在研究所。由于经常去亚洲经济研究所看资料，感觉亚洲经济研究所内斗争非常激烈，相互纠缠不休，张贴些“打倒某某”或“打倒矢吹晋”等内容，让人觉得像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笑）。国际问题研究所则比较平静，秩序良好。记得文化大革命大体发生在 66 年 7 月前后，当时卫藤先生正在香港。翻阅记录便会知道，大概他那时正在接受采访吧。总之，他指出了毛泽东得了脑软化症。我当时想：“哦，是这样呀。哎呀，会是这样吗？”由于自己没有怎么跟踪研究文革，因此也不是十分清楚。总之，我觉得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种新生物。在尚未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时，实际上不是已经出现了各种矛盾吗？因此，在体制上并没有出现多大变化，很大程度上属于新瓶装旧酒，因此毛泽东曾希望予以修正。他觉得当时的中国体制并非自己认为的社会主义，希望能够予以纠正，但其中也有引起自己共鸣之处。这里所说的共鸣，大概是指 60 年代，也有人认为是此前的“68 年问题”。例如“全共斗”（学生运动）问题、法国的拉丁语（Quartier Latin）区示威游行以及美国的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所积极参与的反对越南战争的研究者集团——忧虑亚洲的研究者委员会（Associatio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运动等，60 年代后半期至末



期，正处于世界的思想潮流发生巨变的流动期，是人们纷纷探讨后现代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属于前现代的同时，有时又表现为特殊的现代主义者，有时则是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因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如果说文革属于一种思想上的后现代大潮，那么当初我也与之产生了某种共鸣。有人批评说，这从最初便是一场权利斗争，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患了脑软化症。

川岛：正是这样。我认为有很多研究者对文革持支持态度，同时，也有人站在中嶋岭雄先生的立场。如今回想起来，不同的人就应该有不同的立场。虽然这只能从留下来的资料进行分析。当时学生运动非常盛行。您当时是否与运动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毛里：我已经改邪归正了。

川岛：“全共斗”世代，即 68 年前后在东大的研究者们曾对文革开展过热烈的讨论。

毛里：大概法学系的佐藤慎一也属于这一年代吧，因为他比我小 10 岁左右。因此，他也同样被卷入了 60 年代末的思想运动。所以从他的文章中或多或少能看出一点那样的气氛。

川岛：正如所言。他关于美国的文章如此，对文革也有些留恋。从事美国研究的古矢旬等人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都背负起了历史时代的烙印。

毛里：从这一意义上讲，所处的时代对研究者而言是至关重要、无法跨越的。我认为，研究者本身已经融入了时代，所以将研究者也视为一种客观材料来分析更

好。人们看似非常主动地从事研究活动，实际上则为大环境所左右。

川岛：是的，因为毕竟不是爱德华·卡尔（E·H·CARR），必须进行现代与历史的对话，所以研究者总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的限制。滨下先生 1965 年研究日韩问题的，工作开始的较早，滨下先生是从海潮会（校阅者注：“日本战殁学生纪念会”，一个反战运动团体）期间开始研究日韩问题的。佐藤慎一先生似乎比他稍晚一些。在这些问题上，大家都表现出一些微妙的差异，令人察觉出了其中的时代印痕。

毛里：60 年代属于变化频繁而剧烈的时期，发生过许多事情。也曾受到古巴危机的冲击。

川岛：曾兴起了围绕邦交正常化的日中友好运动。您与这些有一定的距离吗？

#### 提问 19

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过

毛里：总体而言，我大学毕业后选择就职研究所时被要求不涉及政治。要是被卷进去就会很糟糕。与其说是划清界线，莫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采取了甩掉的做法。我没有什么日中友好的概念。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何会没有。我最初是在 94 年写了一本现代中国政治的书，名古屋大学出版会的后藤（郁夫）先生读过草稿后马上寄来了反馈意见。他说自己深受感动，非常好。谈到好在哪里时，他说这与竹内好的文章完全不同。总之，他认为与中国保持了一定距离，是一种日本国内不同年代的全新中国观。我本来就不太抱有源于对华侵略或日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等的意义上的认同感。因此，我认为，与中国不能实现邦交正常化所带来的不利因素首先表现在不能前往中国，我们完全没有自由访问、了解或学习语言的机

会。从这一点讲，我非常希望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并没有为此要去搞什么特别的运动的想法。

川岛：在研究您所提出的创立日本现代中国学问题时，正如您所说的那样，在观察现代中国时，须将之对象化。我也对您能够从日本固有的同一性中将之剔除出来很感兴趣，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与竹内好的研究路线不同的呢？您为何对这些友好运动之类的事情不感兴趣，并表达出不同的感受，其中的原因您自己清楚吗？记得您曾表示不愿涉及政治，这其中有过什么动因吗？

毛里：是呀。接下来，另一件发生在中国、令我最为震惊的事件是林彪事件。这一冲击大于文革，因为文革能够预测得出。革命运动就是那种混乱状况，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状。如果从中国依然处于革命时代这一前提进行分析，并没有其他令人震惊的事情，但我对林彪事件感到非常震惊。中国是怎样的国家，它在做些什么呢？我强烈地感受到它言行不一。不是有影射史学吗？具体地说，在中国常有一些从历史方面进行类推，并将之运用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的例子。林彪事件时，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批判林彪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这种宫廷政治、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十分相似等都十分令人震惊。让人觉得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川岛：的确，宇野先生及山极先生等似乎不太提“对华友好”等字眼。卫藤先生虽然提到“友爱”，但这与“友好”还是有所不同的。

毛里：是呀，应该说这些人属于不同的派别吧。都是与中国有着很深关系的人呀。

我们则没有什么关系。自己只是希望以之为对象开展研究，并不是出于关系方面的考虑。

川岛：从某种意义上讲，从您这一代人开始，都属于与中国没有关系的人吗？

毛里：大概是的。

川岛：看来还是从战后算起的。

毛里：谈到关系，或许存在，但人们都不这样认为。

川岛：如此看来，您在 70 年代是一直从事资料集的编辑及其他新课题研究的吧。

88 年的单行本是最初的著作吗？其后，您调到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持续时间很长，一直到 87 年吧。您最初访问中国是在什么时候？

毛里：应该是 78 年。

川岛：是工作需要吗？

毛里：一半工作需要吧。还属于不能完全自由出行时期，因此感觉像是一种半游玩半工作性质。

川岛：是在北京吗？

### 提问 13

#### 多次访问

#### 过中国

毛里：北京、南京和上海。我所感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冲击只有林彪事件，但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亲自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此前，70 年代在国际问题研究所期间，参加过很多有关中国关系的课

题。因为有很多先生参加，我因此受益匪浅。尤其在预测课题方面，如我参加了1975年的20年后的中国这一预测课题，主要以经济领域为核心内容。这一项目以石川滋先生为负责人。据说石川先生对人要求非常严格，应该还有中兼（和津次）先生，然后有几位经济研究者和政治研究者加入进来。我已记不清自己当时负责了哪些工作。当时石川滋先生曾问我有无对中国进行量化研究的经验。我的专业是政治学，没有量化研究的经验。对此，石川先生说，“啊，我想是的。从量上来考虑事物时，会发现另一种全新的视角。”大概是这样吧。其后，我78年访华期间，与上海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攀谈时得知，当时上海总领事馆希望引进专门的调研人员。因此，我便提出非常希望自己能出任首批专门调查员。幸运的是我自81年开始便得到了上海总领事馆的多方关照。在上海，我回想起石川先生讲过的话，调查了当时非常突出的城市失业问题。在中国的说法是，社会主义不存在“失业”，工人没有工作叫做“待业”。我很吃惊的是“顶替”这一中国特殊的制度。“顶替”，实际上是救济年轻失业者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智慧”。有父亲或母亲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按照当时50岁退休规定，计算还剩余几年，10年或者5年。于是，儿子到了30岁还没有被安排工作，或者25岁仍没有找到工作时，在国企工作的50岁的母亲或55岁的父亲便会退休，并同时为他们25岁的儿子安排工作，或是接收他们的女儿。这一政策曾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全国各地实行。我到各地作过全面的调查。当时目击了非言词记述的、现实的“中国特色的世界”，痛感政治学仅仅读文献是不可能理解得。从这一点上讲，我非常感谢石川先生。81年至83年的在华工作经历，在多种意义上促成了我的中国研究的重大突破。当时得到了很多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关照，十分感谢。

提问 18

研究经历

（包括主

川岛：可谓水到渠成呀。您由历史领域入门，转到文献岗位后打下了基础，接下来在边编辑资料集边阅读相关资料时期前去实地考察。应该把这看做是一种量化吧，加之后用了新的方法论，于是便寻找到了这一全新的方法。

毛里：是的。也因此转向了现代中国研究方向。

川岛：可以说，您找到了捕捉正在发展变化着的事件的方法论吧。

#### 提问 12

受过哪些欧美社会科学、思想(马

毛里：其次令我感到惊讶的事件是昨天读自己的有关现代中国政治的最早文章时想起的，那便是带给我非常大影响的林德贝克(John M. H. Lindbeck)编辑的一本书，书名为《中国：革命社会的管理》(*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出版于 71 年。因此，我读这本书时大概是在 70 年代中期。让

我感受到极大震撼的是它与日本的中国研究不同。在这里，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赛尔登(Mark Selden)、

白鲁恂(Lucian W. Pye)等活跃于第一线的中国研究者都撰写了论文。奥森伯格至 70 年代中期一直在《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上撰文。读这些论文时得知，仅对中国发生的事情进行“说明”算不上是中国研究，不进行“分析”是不行的，而“分析”就需要工具。自己的这些认识尤其受到林德贝克著作的影响。当时自己还在国际问题研究所，想搞一个以分析为目的的关于中国研究的项目，大概是 70 年代末期，我想应该是 78 年前后(不敢确定是否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

#### 提问 17

研究成

时期)，我前去卫藤先生处，表明希望启动“现代中国的结构分析”研究项目，请卫藤先生主持，听取了他的意见。卫藤先生非常高兴，

当即说“用功能主义分析方法来研究吧”。于是，先后邀请了政治、外交、经济领域的研究者加入，冈部达味先生、德田敦之先生加入了，中岛岭雄先生也在受邀者之列。都是响当当有名的学者，运作这样的研究会珍视非常辛苦（笑）。大先生们吵架，受到了很大影响不过《现代中国的结构分析》（卫藤沈吉编《现代中国政治的结构》，1982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这部著作，今天读起来也不失为一部好书。我负责其中有关干部层的研究，中国干部包括传统的、被称作管理层的现代干部及苏联型骨干这三个层面。把着眼点放在“干部”上进行分析时，现代中国的传统、苏联模式以及近代模式的相互关系便会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基于此，我对这篇论文非常满意，尽管论证及资料还有缺陷。撰写这篇论文使我懂得，基于社会科学的分析，至少需要做好这些工作。

川岛：说明中国和分析中国的区别的确非常之大。但还是说明性质的论文居多呀。

毛里：研究者大都采取如何说明才能使之合理的方法。但这对我来说则没有什么意思。

川岛：因为是一种解释学嘛。

毛里：怎么说呢？总之，我们所看到的東西，仅为发生了的事情的某一部分，实际上，或许会有很多我们看不见，或应该发生但实际上并未发生的事情。以解释学进行分析的话，这一部分将会被全部抹掉。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我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受到了较多的批评，但我坚持认为，自己以这一方法进行分析，将能够使中国相对化。基于这一想法，与其与专稿中国研究的人交往，不如与其他的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者接触会更有意思。。。

川岛：谈到中国研究者，正如您所说的那样，他们根本不考虑什么原因造成了应该发生的事情却未能发生。

毛里：是的。说起毛泽东，应该是9月9日去世的吧，随后便是四人帮被清除。英国报纸非常迅速地对此作了报道。记得是10月份吧，这一事件是在10月11日前后发生的。是一家伦敦的名为什么日报的报纸予以报道的。“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吗？”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就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不久，其他的国际政治研究者问我，您认为今后会如何发展，作为中国专家，您认为局势将如何发展？我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便评论说，由于作为接班人的华国锋已经为人们所认可，估计会沿着这一形势发展下去吧。于是，这位外行便表示出不同的意见，认为今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发生权力斗争引发的排挤现象，其后几年将会发生非常大的事情。如此一来，是他猜中了最终结果。包括四人帮、华国锋。据说华国锋的上台不明不白，而且不久，华国锋便被推下台。最终邓小平上台，大约到81年左右局势趋稳。这几年间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吗？时至今日，仍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今有关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会有相应的信息，但当时却没有任何信息，总之当时只能完全凭借推测进行研究。话虽如此，但我仍然坚持认为，首先应该认识作为普通权力社会的中国。而一直单纯从事中国研究，其感觉便会变得非常迟钝起来。这样会很危险吧（笑）。

#### 提问 6

曾隶属过

哪些学会

川岛：是的，我的确这样认为。或许也受到了工作的影响吧。因为国际问题研究所里有各种各样的研究者。如果办公室里的同事来自不同的地区，思想亦不尽相同时，就必须以相同的语言进行交谈。即使使用中文或其他特殊语言，如果不作出全面说明则无法让大家听得明



白，所以需要将之视为普通的权力社会并予以说明。针对阐释不够充分的内容，则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这种情形较为理想。如果一直在东洋史部门工作，则不需要这样做。由于那里可以只用中文进行讨论，自然而然便形成了特殊的概念化。林德贝克的书籍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由于受其影响，便参加了卫藤先生的使用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的石开字宅。是吗？您在这一时期对日本学会还没有什么感觉吗？

毛里：是呀，因为我们不属于学会的主流，与出身东大，走在学术最前沿，或有得过福布赖特奖学金留学美国经历等响当当的优等生之路截然不同，与学会关系较远呀（笑）。

川岛：与您同代年轻人中的中国研究活跃分子有哪些人？

毛里：有谁呢？似乎同代人中没有。同代人中，至少没有现代主义者。那应该是稍后的事情吧。

川岛：有庆应的石川先生，山田先生已经算进来了，大概是这几个人吧。从您那一代起，已经开始有人前往美国留学，其中有高木诚一郎先生，还有山田先生。

毛里：是的。平野（健一郎）先生是在 60 年代初吧。

川岛：中岛岭雄先生呢？

毛里：或许中岛岭雄先生与之算是同代人吧。我认为他的《现代中国论》（青木书店，1964 年）这本书现今读起来仍不失为一部好书。

川岛：是指他的硕士论文吧。

毛里：啊，是吗？是由于他成熟较早吧。

川岛：他以自己的硕士论文而成名，真是令人感到很吃惊呀。青木书店出版的这本书是在东大驹场校园时的硕士论文，与其说他成熟较早，莫如说是超常发挥吧（笑）。

毛里：是的。这本书大概是在 65 年前后问世的吧。总之，他的个人动因应该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吧。是基于对意识形态上的反感而去摧毁、打破它。虽然他是出这样的想法，但我认为他这一 65 年的论文研究得非常透彻。总之，如果按照这一方向继续下去，他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者吧（笑）。

川岛：还是想推荐人们读一读《中苏对立与现代》（中央公论社，1978 年）这些书的。

毛里：是呀，他或许真是成熟的较早吧。所谓社会科学，该怎么说呢？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并非上了年纪便无法工作的领域，这与其他领域有所不同，具有凭借某种经验、判断力及知识的积累而开展工作的特点。从这一意义上讲，切不可操之过急。

川岛：您于 80 年代后期调入大学，此前您有过这一想法吗？

毛里：其中有很多原因啊。大概从 80 年代初开始，曾发生过很多事情。具体而言，这可谓日本非常典型的特点，所谓的智库或研究所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我们大多以消费品的形式被使用，身份极其不稳定，工作性质也属于“活动型”。从

事基础研究，没有人要求我们将成果回馈给社会或提供给外务省。从 80 年代起便进入了这样的时期，人们认为这将会无法持续下去。亚洲经济研究所是唯一的基础研究机构，而且让人觉得是它因为极力开展“螭壶型”研究才得以存活下来的。诚然，这一做法有利也有弊，但亚洲经济研究所不是也因而培养出了大批的亚洲研究或区域研究人材吗？如果说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当到了一定年龄后，便被安排到行政岗位上，无法再从事研究工作，所以大家都先后离开。在国际问题研究所里，即使年富力强者，也不让他们从事研究工作，让人觉得是一种

#### 提问 5

从事教师、研究职务的经

人才的浪费。在这样情形下，我感到自己已经不能不离开了。

川岛：原来如此。您是出于什么原因，最终决心调离国际问题研究所的？

毛里：嗯，倒不是什么决心。静冈县立大学是一所新创办的大学，而且非常漂亮。去新的地方不是很好吗？我非常喜欢搬家，也非常喜欢改变工作环境。我对经常变换工作场所几乎没有任何抵触情绪。

川岛：当时是 1988 年，迄今已经有 20 年了。调入大学后便开始执教了吧。在国际问题研究所期间，也做过外聘讲师吗？

毛里：曾经做过，记得最初是在学习院，担任的是东洋政治外交史课程。一直持续下来，做了很长时间。其后，也在都立大学担任过科目，总之担任过很多次外聘讲师。

毛里和子教授采访（2）

时间：2008年4月23日（星期三） 14：00~16：00

采访者：川岛真（东京大学）

出席者：益尾知佐子（早稻田大学）

\*【】为记录人根据上下文添加部分。

提问 14

是否与中

国学术界

川岛：您在国际问题研究所期间已经开始与中国开展交流活动，是否同时也同中国的学术界或研究人员开展过交流？

毛里：嗯，两国间的正式会议即现今所谓的第二轨道会议始于80年代的84年或85年，大概是84年吧。

关于国际问题的日中两国研究者论坛以常规的形式启动。除此之外，与学术界的交流我不太清楚。

川岛：研究者论坛是与对方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之间开展的对等级别的会议吗？

毛里：是的，是对方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基本上是外交部的所属部门。相当于日本的外务省，所以在性质对等的前提下开展起来。

川岛：当时与您进行讨论的是对方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哪些人呢？

毛里：大概都已经退休了吧。由于这一机构的人员大都会成为外交官，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开通了非常有益于了解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渠道。

川岛：与其说是交流，不如说通过这一窗口获取各种信息吧。

毛里：的确感觉如此。大概是由于学术界之间的正式交流还没有开始吧。

川岛：或许是这样的，说不定因此才得以在中国研究所等左派机构中逐渐开展起来的吧。

毛里：这属于极特殊的形式吧。这一形式迄今仍未形成制度化。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等有所不同，我认为最好能够再设立一些规范性机构（智库）。

川岛：与美国没有交流吗？与欧美的研究机构有些什么关系呢？

毛里：曾与胡佛研究所开展过频繁的合作。其后便是与个人的合作。例如，邀请一些意见领袖人物，也有受到庆应大学或东京大学邀请的人。这些均由我们负责筹备，我曾做过类似的事情。

川岛：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活动中，您曾负责这些事务吗？

毛里：是的。

川岛：您退休前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曾经担任过研究部里的一些诸如协调方面的工作吗？

毛里：总的说来，由于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里有杂志等出版物和定期出版物，还要出版被称为《国际年报》的年鉴，因此研究员需要承担这些工作。我被指派做过大量类似的工作。接下来怎么说呢，例如受外务省委托或由国际问题研究所自己拟定的研究项目，需要编写这些项目的申请计划，并向上级提交，此外不是有NIRA（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吗？也同该机构进行合作。这时的计划、申请报告都

由我来负责，出任干事，具体推进项目以及编辑出版书籍也成为我工作的一部分。可以说做了多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个十分必要的过程，对后来调到大学后也起了很多作用。

川岛：与当时有所不同，如今对经费与项目的管理非常严格，文部科学省的审查非常繁琐。在经费方面，是如何使用外务部门资金的？非常严格吗？仔细审查过吗？

毛里：没有。怎么说呢？在这方面，与其说外务省审查繁琐，倒是接受了会见检察院及其他部门的检查，他们甚至一页一页核对原稿，查看是否有缺漏页码。实际上拿给他们的有很多是“骗人”的稿件（笑）。比如，最初与最后的页码完全不吻合等。因为使用国家税收，所以即使检查比较麻烦，也是当然应该做的。大家都说文部省经费或科研费的申请表填写很麻烦，检查很烦，但既然使用税收这一公共财，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

川岛：那么，接下来想请您先谈谈调入静冈县立大学后的情况。在搬迁到静冈并调入大学后，您没有担任那里的研究班课程或博士课程吗？

毛里：没有。

川岛：担任过硕士的课程吗？

毛里：没有，只是本科课程。其后，在那里工作的7年时间里，我中途曾设想开设硕士班。应该是我在那里工作4年之后开设的吧。听说后来博士课程也开设了。

川岛：当时的授课是有关现代中国的内容吗？

## 提问 8

### 授课计

毛里：嗯……，是“亚洲课程”。其中，我主要担任现代中国的外交与政治部分，现代中国社会部分由菱田负责，另外还有一人，他负责历史部分。我觉得环境很好，因为我们那里至少有 3 个人。再加上东南亚和俄罗斯，这一地区研究课程便被称为“亚洲课程”，其目的在于开展区域研究。因此，教授外语也成了我们的工作。

川岛：您曾教过中文？

毛里：是的。

川岛：这样一来，每周的授课节数不是会很多吗？

毛里：能不是这样吗？中文两节左右，专业两节左右，然后是研究班课程，因为（当时还）没有研究生院。不设研究生院很好呀，有了就会非常辛苦。

川岛：这样说来，这并不是培养研究人才的地方呀。

毛里：是的。但是，相信哪里的大学都会一样，开办初期的静冈县立大学里有些朝气蓬勃的学生。因此，从这一点上讲，我当时感到非常有趣，心境也不错。

川岛：是这样呀。您的学生中有活跃在对华事业上的人吗？

毛里：没有。怎么说呢。大概就职地方公务员者居多吧。地方公务员也是优秀人才的一类吧，因为目前静冈的财政状况还不错。随着法人化的实施，所有的县立大学不都是步履维艰的吗？（静冈县立大学）还算相对好的吧。

川岛：您调入大学后就可以申请科研经费了吧。

提问 7

获得了

毛里：关于科研经费嘛，一开始就启动了重点领域课题。

川岛：没有申请“基盘研究”经费吗？

毛里：呵呵，当时不知道还有这一资金呀（笑）。在研究所里，是不需要这种资金的。自己制订计划，自己申请资金，去做一些相当于申请科研经费的事情。因此，基于这一点，并不知道还有这种资金。但在申请重点课题之时，文部省曾告知过我。文部省方面告知我相关的内容及其范围，表示中国非常重要，询问能否想办法设计课题。最初提出这一计划的并不是我，而是对方。因此，我决定尽己所能进行研究。预计 96 年正式启动，但实际是 95 年。大约从 94 年开始着手筹备的吧。因此，在 1 年的筹备期里，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并作出如 200 万或 300 万日元的预算，用于召开筹备会议。这发生在 95 年度。实际上，中途曾创设出大型项目并提出申请。从 96 年 4 月开始正式启动。因此，该项目实际上历时 4 年。96 年启动，96 年、97 年、98 年到 99 年，99 年 3 月结束。由于我是从 99 年 4 月调入早稻田大学的，所以项目一结束，我便来到了这里。最终阶段非常辛苦呀，应该是 98 年吧。总之，截至 3 月 31 日，项目全部结束。

川岛：这一重点课题获得了重大成果吧。我记得自己当时刚好在读研究生。

毛里：当时你是在法学系吗？

川岛：不，我在东大文学系读研究生。

毛里：文学系的研究生？



川岛：当时我在读文学系的研究生，98年到北海道大学法学系任教。记得当时曾听周围的人谈论过有关这一重点课题的各种研究会及相关情况。

毛里：是吗？由于有许多人参加，所以非常有意思。有过争论，尤其与7个小组的负责人发生过非常激烈的争吵。由于大家都很积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即使有争论也很有意思。如果这种争论在2007年启动的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研究基地联合项目中也能展开的话，就好了。可是很难啊。进入21世纪后，文部科学省振兴研究的方法变成了基地方式，使大学及研究机构相互竞争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并不好，我认为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很难说这种方式能促进日本的学术成果的提高。

川岛：独立性过强吧……

毛里：是的。归根结底，总体上属于纵向型。不论网络如何发达，其本质仍属于纵向型。因此，我曾在岩波书店出的《图书》上发表文章（2007年11月，《竞争·基地型研究的功与罪》写道，这种方式可临时用作“强心剂”，但永久使用这一形式开展研究则未必好。

川岛：我也这样认为。好象是主权国家聚集在一起一样。

毛里：是的。主权国家之间不也不尽相同吗？

川岛：因为既有联邦制国家，也有国民国家（笑）。

毛里：的确如此（笑）。好像是主权国家在相互竞争一点点预算，真是问题。在

开展重点领域课题研究时，基本上是自下而上，不是大学，而是各个研究者自由的参与。

川岛：是呀，基本上是个人参与。

毛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代表任何组织。

川岛：因此，资金大都落实到个人手里，主要调整研究者个人的要求。

#### 提问 17

研究班

毛里：如果说有竞争的话，则出现在各个研究班之间。例如，中兼（和津次）小组的竞争意识非常强。我认为这非常好，会让人思考如何使自己的小组做得更好。我认为这种形式的竞争非常好。

川岛：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呢？

毛里：7卷？不，应该是8卷。卷数比研究班数多出一个，是由于还有综合卷，是研究班数7再加1。

川岛：以这种研究班的形式进行课题研究，在竞争中每班各完成1卷，这很有意思，的确会导致很多争论发生，曾产生过很大影响。那会成为酒馆里的话题，但当代中国研究基地却不会成为酒馆的话题。像我们就去非洲玩（笑）。

毛里：哈哈，今天刚听说这件事呀（笑）。据田岛先生讲，川岛先生当时去了非洲，是扎伊尔还是哪个国家吧。

川岛：是吗（笑）？我去的是马拉维。

毛里：马拉维？大家都议论你为什么去那样的地方，结论是因为“钱包在他自己身上”（笑）。

川岛：我们那次访问可是非常认真的（笑）。当时因为马拉维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为了解它为何会与台湾断交而改投了北京。为此，我们正式采访了对方的外交部副部长及美国大使。通过采访，彻底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今后将进行细致的整理归纳。远藤贡先生一直研究非洲问题，他也不失时机地加入了此次访问。此外，我们还访问了南非的中华民国台湾代表处，并前往台北采访，做得非常认真呀（笑）。我们曾做好各种能够证明不在现场的准备，以备盘查。高原明先生当时去了坦桑尼亚。

毛里：然而，这种调查非常重要呀。因为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到。

川岛：我认为，即便只写一些现场报道形式的文章，也会有其本身的价值。

毛里：是呀，作为一种事件记录。例如发表在《论座》等刊物上。

川岛：我现在正考虑向《读卖新闻》专栏投稿，因为采访的是对方部长级人物，并从各方面询问了事情的原委。马拉维总统刚好访问了北京。其间，他先后访问了四川省和深圳市，希望能够同地方政府签订协议。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相关情况。其后，我访问了南非。会见了一位担任南非约翰内斯堡市议会议员的台湾人，向他询问了一些有关当地的台湾人、华人社会以及中国的政府援助（ODA）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我还就中国向当地提供政府援助后，当地的华侨企业是如何盈利等问题进行了提问。我认为，同从前的中国研究一样，现今到当地去亲自考察，自有其有意义的一面，尤其是非洲属于“前线”，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那么，重点课题的7个研究班的构成方式是如何决定的，您是自己选择的吗？

毛里：是的。

川岛：有没有形成研究会母体的东西，或是完全上级决定？

毛里：都不是，完全是从零开始。

川岛：是这样呀。当时，您来负责该课题，当时有没有关于某种正统性的讨论？

毛里：不知道。因为这不是我所能判定的。

川岛：您当时有过不适应或关于是否可行的犹豫吗？几乎没有，或是否有试试看的想法？

毛里：嗯。这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项目，有研究经济的中兼先生、加藤（弘之）先生等这样一些重要的主流人员以及研究历史或外交领域的人员参加等。这些几乎尽人皆知，因为大家参加同一项目嘛。从这一点上看，似乎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这也构建出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网络，如某人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迄今一直持续研究等内容，给人一种信任感，让人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在分配任务时会告知各研究班，例如，“你们负责经济部分，可以完全自由开展研究”等。也会提出“最好能加进某人”之类的建议，初期或许会聘用这些被推荐者，但不会一直聘用。研究班的负责人会经过一番努力，组成自己的研究班，其后如何开展研究便完全听由负责人安排。只是在召开总结会议时，争论得非常激烈。大家首先担心整个项目如此分散，会造成过度的分散。意识到如果想进行结构性变革，就要弄清结构的涵盖范围。这归根结底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变革

还是属于经常性的改变，并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创建一种共享平台，使之成为了解中国政治变化、社会变化的样板。这样做的难度相当大。

川岛：讨论最多的核心问题和对立点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毛里：并不是严密意义上的对立。一个大问题是，首相要弄清何为结构变动。因为对现在的状态没有一个共识，如不搞清楚从什么变到什么，即使说变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把握的视角及角度都不一样。我基本上认为，毛泽东时期的二元结构的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演变为三元结构。之所以说三元“结构”，是说这一“结构”将长期持续中国处于三元结构性的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中，比如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在改革开放时代表现为中央—地方—基层的三元结构，无论如何也无法以二元或二元对立轴的方式解读中国。这是最为显著的变化。<sup>7</sup> 各研究班的带头人就此进行了很多讨论，但由于我的能力不足，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假说、观点，这令人遗憾。另一个是历史问题，思考现代中国的时空问题。在从事中国研究时，用一般大家一致同意用近一个世纪的长时段来思考。但这说起来容易，实际上非常困难。也就是说，如何对一个超越政治框架、国家框架的巨大变化加以把握是很难的。。也就说到底有什么是联系着现代中国的？总值，我希望历史班能够开展一些以现在的眼光重新构筑历史的工作。但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这完全是歪门邪道。。但既然大家参与了“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大型项目研究，我就大胆地请他们走走邪道（笑）。西村成雄先生是时历史班的带头人，我几次参加了他们的研究会，甚至抱定吵架的决心。但却始终没能唤起对方的共鸣。也许这是当然的。

川岛：非常理解。在岩波的会议上，我也曾提出过这方面的事情。如果现在不首

先对某一问题进行回顾，不通过对这一问题进行历史定位，认真反馈给社会，以目前的情况看，日本的历史研究本身将会垮掉，无法生存下去呀。虽然主张两种方式并存的声音都非常大。关于历史部分，今后将会有新书出版。历史研究者所重视的自然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他们认为这可为现代提供借鉴。但现实并非如此，如今我们看待过去，认为很重要的，其实已经有了现代背景。对这种现代性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即使“将错就错”也无妨啊。

毛里：这就是命运呀。

川岛：与您争论时相比，如今这种争论获得认可会容易些，但仍然有着非常强大的阻力。如果我提出这件事的话，一定会遭到文学部的史学科的否定吧。

#### 提问 19

在何种程度上参与

毛里：大概如此吧。问题之一是实证主义的方法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我认为从根本上存在着发展史观。即使是在迄今的 100 年中也存在着发展史观，即现代主义。或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代主义，事态就是这样向前发展的。

但是，如果再稍微从虚无主义的角度思考是否果真如此时，或许会得出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如此的结论，这就需要再次求证。换言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如果以 100 年或 200 年为单位进行把握的话，这在发展的大潮中或许会显得过于短暂。这些问题总是难以得到顺利解决，怎么说呢，是没有能够完全合拍吧。但我认为，由于对话具有其自身的意义，这也不能说是不好。例如，历史班中有人研究过天津的都市形成及 20 世纪初期的天津问题。大概是由于（天津）发生过推进都市化的尝试吧。

川岛：是吉泽（诚一郎）先生吗？

毛里：不是很清楚。想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是贵志（俊彦）先生，或是其他人吧。我请他们一定要考虑，天津的 1910 年代的城市建设与 21 世纪的中国的结构变动到底有什么关联性，对即将迎来 21 世纪的中国到底提出了怎样的问题（笑）。

川岛：但是，虽然贵志先生当时似乎并没有做出让您满意的回答，但那以后他所开展的研究的确是走入了这一方向。他目前所主持的（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研究费）“基盘研究 A”课题就是关于这 400 年间东亚的外国人地位的问题，显然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今天的现代社会问题。

毛里：啊，应该说是适当的接触而带来的变化吧。虽然曾发生过摩擦。但还是有所变化了吗？

川岛：想必是有一定的潜伏期吧（笑）。我想终究还是要表现出来的。

毛里：只是一旦矫枉过正，也还是会带来一些问题的，这也是其难点所在呀。做一次与现代进行比较的求证，怎么说呢？是一种理智的选择。虽然这样做能否接近真实的历史尚不知晓，但不妨尝试一次。这便是我的想法。

川岛：您师从市古（宙三）先生时，攻读的是东洋史。从这一点讲，您是否有打破历史学传统方法的分析方法？

#### 提问 18

#### 研究经历

毛里：是呀，我一直认为，现代史是无法用历史学的方法进行解释的。也许会被历史家训斥，我认为对近现代史的研究，不

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手法是不可能进行分析的。例如资料，由于数量非常庞大，无论如何是需要研究者意思无意地加以选择的吧。翻阅可用资料时，即使计划阅读 100 部，实际上也不会就读这些，一定会有选择。即使客观被选择的，如出版发行的书籍，不会有未出版发行的资料，但却有很多没有写出来的史实。譬如，无论从哪里的农民叛乱看，都没有留下不具有记载历史权力阶层的历史，完全没有任何记录。因此，比如说某人，是高山晋作吧，他曾相对接近中国，在香港观察了鸦片战争时的情况，留下了这样的记录。虽然也有一些反映那一时期的出自第三者之手的旁观性记录，但却没有暴动者自身的主张。即使说是第一手资料，哪些是第一手资料也未必清楚。这样想来，近现代史都不知不觉中分别有了各自的框架，其后即使对其进行筛选，也只不过是新组织的事实而已。历史不是再生的，而是在堆积新事实的基础上编写出来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在思考历史学对近现代到底有什么意义，怎么也消不去对历史学本身的怀疑。

川岛：这一结构变革，正如您上次所讲的那样，问题在于要把中国纳入区域研究的对象，不是把中国的出版物翻译过来加以说明，而是进行分析。在这两点上，是否可以认为您是一直贯彻下来的呢？

毛里：怎么说呢？这还不是很清晰，还不能完全下定论呀。因此，中国研究的难点，怎么说呢？虽然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了 10 年，据说变化非常巨大，但却不允许追踪研究呀。既不能追踪信息，也不能从方法论方面进行追踪。因此，与发生结构变革的 90 年代相比，可以认为如今变得更为困难。

川岛：这表现在，中国本身的变化如此，中国学术界也是如此。



毛里：是的。虽然有研究的意义，但却非常困难。

川岛：这样说来，您做重点领域研究课题历时 4 年，并出版了著作，其后到任项目代表（COE）之前，参与了哪些大的项目了吗？

提问 7

获得了

毛里：几乎没有。重点领域课题完成之后，从事了冷战史研究这一较大项目。这是因为，日本的冷战史研究非常滞后，不得不想一些办法。虽然这并不一定需要我去想些办法，但我还是希望自己做做看（笑）。“基盘研究 A”是非常有意思的项目，由 20 多人组成的研究会里，研究日本外交的人很多，也有研究俄罗斯的人，藤原归一先生等也参与其中。其实开了多次非常有收获的研究会，但是连一本书也没有出版。许多档案公开出来，但是人才却很少，跟不上。大型的冷战史研究，尤其是与国际冷战史研究搞合作的大型研究，只有交给下一代研究者了。就在这时，COE 启动了。

川岛：您曾说过，远藤诚治先生也非常有趣呀。

毛里：我与远藤先生也是在那里认识的，他与我有着很大的差异，首先是想法不同。因此，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总之，有如此有积极性的人加入是一件好事吧。

毛里：接下来，从事外交研究的人与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人的想法也不尽相同，再者，研究亚洲的人与研究欧洲的人，其想法也迥然不同呀。

川岛：是有所不同的。

提问 19

在何种程

毛里：中国研究命中注定的一件事是，正如上次所提到的那样，如何看待它的问题将取决于中国研究专家呀。它的势力不是非常庞大吗？虽然中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大家都进行封闭式研究。从种种意义上讲，这种情形极为不理想，我希望能够从世界及国际政治的视角，将中国及中国外交相对化。这就需要做一些从较高的全球化角度予以关注的工作，如比较政治学及比较经济学，就需要有中国分析专家加入进来。例如，在政治学等领域里，中国研究还没有成为对象，根本不在话下。因为是边缘的边缘，根本不被看作问题，对此我甚至感到恼火。这真是天大的玩笑（笑）。意大利政治的分析框架可全都是政治学，这是哪儿的话？

川岛：哈哈（笑）。那您对葛兰西等人的思想是不能接受的吧。

毛里：这种多党制政体不够稳定。虽然是一种多元化民主主义，但那只是一种形式，中国式体制也应该被视作政治学的一个对象吧。

川岛：中国研究属于政治学领域中最难解的类别呀。这也是我在北大时读四年级后期时所学的课程呀。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因为自己被推到了内容最为难解的领域，是属于边缘的边缘。政治学的确是令人头痛的科学。这一科学起源于欧美。虽说如此，但关起门来，只做一些中国研究专家才能理解的中国研究也不是很好吧。这其中有一定的难度呀。虽然我曾督促学生在综合社会科学专业的学会上发表论文，到政治学会等场合去发表论文，并告诉他们，如果在现代中国研究会或亚洲政经学会内部发表，只属于在亚洲研究圈子内，这种做法不是很好。

毛里：你曾在比较政治学会发表过《从比较政治看中国》这一特辑吧？在 2 年前

或3年前。三宅（康之）曾在那里发表过非常好的论文。但另外一位东大的人则发表论文，认为不能构成比较政治的对象。对此我很恼火，认为绝对不会是这样的。因此我意识到，如果要在中国纳入比较政治框架内，就需要一些条件，就需要创造这些条件。我认为这是能够做到的。

川岛：三宅先生在京都参加过很多次辩论，很擅长于从理论方面论述中国呀。他的文章非常容易读懂。真希望这样的中国研究能够不断发展起来呀。

毛里：是呀。希望最终能够达成共识，使得中国研究能够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川岛：您在比较政治学会中主持分会，到静冈县立大学从事重点领域课题研究时，是否仍然与学术界保持着各种联系？与亚洲政经学会呢？

提问

如何评价

毛里：是的。特别参与了国际政治学会后，真是太忙碌了（笑）。我认为绝对应该脱离出来，在国际政治学会，一介中国研究者的我绝对不应该是主流，毅然辞掉了理事长职务。我只是一个地区研究者。结果我成功脱身，但给山本吉宣先生（东京大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笑）。

川岛：那么，国际政治学会之后，应该是现代中国学会吧。

毛里：是的，结果还是参与了现代中国学会的工作。中国研究所发行的月刊（《中国研究月报》）办得不多，论文也好，书评也好，每期都会有很多可读的文章。想必每月的编辑工作一定非常辛劳。

川岛：应该告诉田岛（俊雄）先生呀，因为他曾运作这一项目。

你在国际政治学会、现代中国学会、亚洲政经学会、比较政治学会都当过理事？

提问 6

隶属过

哪此学

毛里：我是最近才加入比较政治学会的。由于需要在学会上作报告，所以就加入了学会。然后是日本政治学会，由于也必须在那里作报告。大概是远藤诚治先生在成蹊大学工作期间吧，当时他邀请我做一次报告。只是那时加入了，其后则没参加过什么活动。

川岛：学会的事情很耗费精力呀。您是在这些学会先后担任要职的同时，主持了重点领域课题，又出任 COE 的代表吧。应该说您的工作十分繁重。在 90 年代后期开始的 10 年时间里，您真的非常忙碌呀。

提问 7

获得了哪

毛里：另一个同期进行的项目是与中国举办的论坛，这是国际交流基金的项目。我认为国际交流基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每年的预算额为 1000 万日元，要求每年举办 2 次会议。旨在为日中两国研究人员，尤其是非中国研究者了解中国、接触中国提供平台和渠道。这一论坛举办了 6 届。这与 COE 职务有着 1 年的重叠期。应该是主持 COE 前一年结束的吧。那是主持 COE 与冷战史研究工作有过 1 年的重叠。所以，真的十分辛苦呀。

川岛：这些几乎都是完全交由您来完成的吗？

提问 14

与中国学

术界及其

他单位开

毛里：是呀。非常信任我。虽然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但确实非常有意思。由于要最大限度地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所以人员较为

固定。如日方的五百旗头真先生、藤原归一先生等各体系学者。然后是山本吉宣先生，他曾尽最大的努力予以配合。总之，中国研究学者中有天儿（慧）和我吧。后来又吸收了其他人加入，中方也加进了 2 名日本研究学者。再后来便是国际政治、中美关系或理论方面的学者的加入，如王缉思等。目的是希望尽可能形成一种联系紧密的知识型网络。怎么说呢，我认为以这种形式开展活动，今后仍有一些事情是要做的。最好是能够设立一个类似的知识小组的组织。虽然这一项目历时 3 年，已经结束，但我还是希望今后由哪一部门继续做下去。譬如，由外务省等部门对该项目进行间接的援助等。我希望能够开展这一项目。但外务省嘛，怎么说呢，对无条件地交由别人来做表现得非常消极呀。

川岛：连续 3 年，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吧。

毛里：无法完成。他们大概认为如果开展这一项目，最好是采用第二轨道或“一点五轨道”制，即他们想加进外务省的相关人员。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相关人员参与反倒更好。在美国，有很多财团或基金，很多项目通过这种资助开展起来。既有与政府保持距离的，也有如布鲁金斯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兰德公司（LAND Corporation）等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智库都在发挥着作用。日本很难成立这种基金或比较自立的智库，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市民社会的成熟度的不同吧。

川岛：举一个例子吧。由于日中历史合作研究的人员经常见面，所以他们发展到了以正常方式交流的程度。其后，在日本财团开展的项目及刘杰研究的项目里，人们也常常见面。这样继续下去，便会形成集体意识。真希望出现越来越多这样的平台呀。

毛里：是呀。在基本观点方面，虽然会随着某种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在最基本的方面大家还是有信任感的，建立信任感是很重要的呀。

川岛：这一论坛只是日中两国举办的吗？没有邀请日中两国之外的人员参加吗？

毛里：只是日中两国。

川岛：沟口雄三先生也曾运作过这一论坛吧。

毛里：那是比我稍早一些时候举办的。孙歌先生和沟口先生举办的论坛完全是个人性质？

川岛：是个人性质的。

毛里：经费也是他们自己筹措的吗？

川岛：不是，是由国际交流基金提供的。有基金会支持，由孙歌先生和沟口先生负责运作，出版由岩波（书店）承办。

毛里：哦，这样呀。我觉得沟口先生还是很了不起的。这可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呀。

川岛：的确举办得很成功呀。这样说来，您是在同时做冷战史、重点领域课题和论坛的工作呀。很辛苦吧（笑）。离开静冈县立大学，您主持重点领域课题的研究，之后便调到了横滨吗？

毛里：离开静冈县立大学后到了横滨（市立大学）。重点领域课题主要是在横滨完成的。

川岛：在横滨市立大学时，您指导博士生吗？那里如今还没有设立博士点吗？

毛里：当时虽已有硕士点，但很可能还没有博士点。那里的人们与其说是研究，莫若说是更注重实际业务。因此，学习欲望较高的人中有如今被录用为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教的我的研究班学生。他的专业是开发经济学吧，后来，他从横滨考入了一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院。我在自己的学生中推荐了几个人去一桥大学。

川岛：从横滨市立大学去一桥，您为何对那里有如此的亲近感呢？

毛里：并非出于什么亲近感，那是因为东大的门槛比较高呀。虽然如今已经不同。哦，现在已是迥然不同了。当时我的意志比较坚定，让他们进入一桥大学，尤其是不隶属于法学系的社会科学研究专业。因为学科范围非常宽，且招收各学科的学生，于是几名学生便考入了那里。一桥大学容易考取，而且风气也比较好。

川岛：我也认识几个从横滨市立大考到一桥大学的人。

毛里：他们都成长起来了，真有些不可思议呀。这是因为一桥大学有自己的强项吧。他们都属于倾向于独立研究的人，从这一点看，一桥大学或许更适合希望独立研究的人吧。当然，这也取决于不同学生的资质和性格。不是有一些学生希望放任自由的吗？或许比较适合他们这样的人。

#### 提问 8

#### 授课计

川岛：哈哈（笑）。原来如此。您在横滨市立大学的授课内容也是“现代中国”吗？矢吹（晋）先生呢？

毛里：矢吹先生在商学系。与他不同，我在国际文化学系。国际文化学系的前身

是文理学系，从事的是现代中国研究。

川岛：那是讲义吧，讨论课也一样吧。那时没有中文授课吧。

毛里：没有中文课。

川岛：您在那里执教多少年？是否持续时间很长？

毛里：长达 5 年呀。

川岛：听说平野（聪）曾帮助您进行了重点领域课题的研究。

毛里：是的。当时平野来到横滨。虽然还记得在横滨从事的重点领域课题的事情，但在横滨授课的内容却几乎记不得了。那里的学生中有一些人精力非常旺盛呀。总之，有很多学生是不听讲的，很有自己的个性，包括一些专科生，他们拥有很高的天分，其中有几儿，我认为如果他们能够更认真地学习，考入研究生院该多好呀。但他们还是专科毕业后便就职了。

川岛：小岛晋治先生也曾就职横滨市立大学吧？

毛里：在横滨市立大学从事中国研究的有小岛晋治先生和山极先生。我是在山极先生之后调入的。那里有着这种传统。尤其是小岛晋治先生非常努力，开创出了一个学科呀。

川岛：您在市立大学时也是以研究班的形式为本科生和硕士生授课的吗？

毛里：是的。



川岛：因此，才有一些学生升入了一桥等外地的大学，立志从事研究工作的吗？

毛里：是的。因为横滨市立大学没有这样的条件呀。

川岛：山极先生到了横滨市立大学，您也被邀请过去了。那么，您是否也曾与早稻田大学有过关系呢？您在那儿担任过外聘教员吗。

毛里：是啊。早稻田大学国际政治学者山本武彦先生是我在国际问题研究所时开始交往的老朋友了，当时他在国会图书馆工作，是他帮我叫去的。在早大政治学研究所，我成了 125 年历史上的第 1 名女教师，第 1 个中国研究者，第 1 个地区研究的授课老师。由于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传统，非常有干劲。

川岛：是嘛。那么，您是一到了早稻田大学，便开始主持 COE 项目，还是稍后呢？

毛里：那真是晴天霹雳！1999 年来到早大，很快就开始主持“基盘研究 A 对冷战史的再探讨”项目。COE 项目是突然来的，是 2002 年吧。

川岛：到了早稻田大学之后，大都应该都是教育方面的工作吧，课程很多，又要指导博士，是否觉得突然改成了研究人才培养方向？

毛里：倒是没怎么想过。将来的事情不太考虑，以往的事情也没怎么想过（笑）。调到早大时，也没有说一定有什么计划或要做什么。都是事到临头，匆忙招架的感觉。。但早稻田大学的政经系里没有一个从事中国研究的老师，在早大中国研究是支流，所以应该做点什么的心情不是没有。

川岛：我想，在当时整个日本学术界中，设有现代中国学科的学校未必能有几个。在政治学领域，设有亚洲学科的学校也极为罕见呀。虽然庆应大学有相应的学科。

毛里：是的，庆应属于例外吧。中国研究首先出现在爱知大学，那里的中国学系是何时成立的来着？那该算是一件象征性事情吧。

川岛：是的。记不清是哪年成立的。

毛里：加加美（光行）先生是何时调到那里的？

川岛：2000 年前后，或是更早些吧。

毛里：或是 90 年代、90 年代的中期，或是中期到后期之间？总之，在日本的传统学问中，虽然有东洋史，但在社会科学中却没有中国研究。

川岛：已经不是东亚同文书院了，说起来不太好听，中国研究算是“二种”学科，不是“生涯职业志向的人”所从事的工作。

毛里：的确如此。一桥或许是个例外吧。

川岛：一桥大学之外还有外国语大学，但那里的学生大多面向实业领域，他们实际从事的是一些事务性工作。总有这样一种气氛，从事中国方面工作的人在外务省内即使往上升，充其量也只能升到局长级，决不会升到更高级别。如今这种倾向依然存在。中国研究者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您到早稻田大学主持 COE，COE 是内部提出申请。中国研究这一建议是由您提出的，而不是由上面委派下来的吧。

提问

7

毛里

毛里：坦率地说，像 COE 这样大型的项目，其申请的可能取决于、特别是带头人。带头人要看有无从事大型研究的经验，是否对文部省有过影响，在学会中是否有影响力等。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非常希望能申请到这个大型项目，而我有担任过几个大型研究项目代表的经验，对文部省及学术振兴会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就被选中了。当问及申请什么内容时，系里领导表示并没有什么既有方案。于是我前去平野健一郎先生处请教，他比我早两年进早大，同样是外来户（当然是我的大前辈）。他建议说，无法组建全校的研究现代中国的专家组，但早大有很多现代亚洲研究者，所以可能开展“现代亚洲学”。这个项目与科研费不同，对文部省、对大学以及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到底是以研究为主还是以教育为主，意见相当混乱。这个混乱一直持续到最后。还有一个难点是，刚调到早大的我，连政经系内的同事都不熟悉，所以完全不清楚哪个系里有哪位亚洲研究者。重点领域研究时的成员，都彼此知道性情的研究者伙伴。但是 COE 就不一样了。。川岛：是呀。召集人员，还需要安排合适的岗位呀。那么，您在这一期间，从培养研究人才方面讲，包括 COE，指导研究生院的博士生，是否培养出了相当多的博士生？

毛里：不，并非如此。

川岛：人数不多吗？

提问 9

是如何

毛里：说起来，到早稻田大学不是还不足 10 年吗？如果真正从教育的角度讲，没有 15 年左右的时间是无法培养出人才的。这非常耗时间呀。据说平野先生在东京大学培养出了 28 名博士生，我

对此感到非常惊讶。我想可能会有直接指导和间接指导两种形式吧，但即便如此，我认为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一定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从事教育工作不投入相当的精力是不行的。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也会耗费很多精力。因此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去热爱它。终归东大是有这项任务的吧。

川岛：有任务。

毛里：在教育及研究人才培养方面，早稻田大学迄今并非如此。但由于意识到了这样做不行，现今正积极做着各方面的努力。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重点国立学校的教育任务很重呀。还有一点，那便是留学生。培养留学生很困难吧。我觉得这是一件令人窒息的工作，非常辛苦。而且，关于教育问题，我迄今仍对教育应有的状态不甚了解呀。

川岛：您所说的不了解，是指方法方面吗？

毛里：既不清楚方法，也不清楚前辈或教师应该做哪些工作。

川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属于教员的思维方式问题，真的很难呀。想法或许因人而异吧。我也感到很困惑呀。这当然不会有什么捷径。

毛里：大概不会有捷径吧。我认为，遇到优秀的学生只是很难得的特例，我自己没有在大学院课程内好好学到什么。我想，有独立研究能力，其自身的问题意识及感觉，及其积极性是成为好的研究者的条件。由此，我可能成不了好的教育者。

川岛：是呀，还是有一点手工艺人的感觉。我也常常想，就像自己的学习经历一样，

大家也一定会是这样的吧。因为不会有模式化的课程计划。既不可能有研究生院相关的教育学，也没有教什么、如何教才算正确的规定。

毛里：最近，尤其是开始指导博士生后我一直在想，我们的能力是否非常有限？换言之，即使培养出独立性的研究人才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我认为还是培养一些不同类型的研究人才，即具有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能力的人才最为理想。但这只靠一己之力是无法做到的。那么，是否集体培养就能够做到呢？我认为这也非常困难。现实中，早稻田大学决定今后将实施集体培养制度，但这种集体培养制度或许会成为无责体制。那么，打造美国式学科网络是否合适呢？这也有其不够完善的一面。我认为，区域研究或许也不属于学科网络。这些问题使人大伤脑筋，并无结论。我认为，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或许实行一种面向各大学学生的开放式教育制度更为理想。首先在学科网络中，为真正有志于成为研究者的人提供一种虚拟的空间，譬如开设夏季现代中国课程，如果属于区域研究，则由主要研究人员从经济、政治、社会、国际等各个基本方面进行指导。即实行一种类似于教员储备的制度，对其进行登记造册，并使这一学科网络得到各大学的认可。这些学生有时属于东京大学，有时又属于早稻田大学，学费虽然较东京大学稍高，但相关待遇等完全相同。我一直认为现行制度不够理想。但没有人如此提倡这种制度，大概会非常难以付诸实施吧。

川岛：举办某种形式的讨论课，并规定参会者学分，由储备教员每两年一次前去授课。学生通过讨论课上的集中学习，打下一定程度的教育基础并获取相应的学分。大体构想是这样吧。我认为这非常可行。

毛里：嗯。这种构想今后有很大的可能性吧。譬如，由于北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

双方有设立联合研究生院的构想，因此，东大大概将会考虑同样的问题吧。虽然联合研究生院与此有所不同，属于配合专业领域而设的研讨会，并非教授全部的博士教育课程，但在那里可以掌握所需部分。这种方式或许更为理想。某某大学某某人的构想，在国际化时代并不适合，也就是说，当以日本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国际社会时，有人认为可以不在日本。但至少是要研究日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在哪里无所谓。现代中国问题，例如说九州大学或京都大学里没有相应科目的教师。这一情形就目前来说是师资力量不均衡。而这种情况，如果九大的学生利用暑期来这里研修，将会带回所学的知识。或许这样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川岛：据说刘杰先生创办了东亚历史研究课程，他那里不仅日本国内，也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的研究生，在那里一同讨论学习史料，在每年夏季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表。这已获得日本财团的支持。但是谈到记入学分问题，虽然刘先生表示“应该以早稻田大学为基础”，但我不主张在那里学习的日本学生取得学分。大概实行学分制更好些吧。

毛里：虽然是否设立了学分制还不得而知，但我认为最好还是能够设立学科学习履历栏。

川岛：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这是一种学习经历嘛。而且也可以记入个人履历表。

毛里：应该将这些经历认真记录下来，有时会因此而受益的。虽然这并不是双学位。现在，早稻田大学内围绕着双学位究竟有何意义争论得非常激烈，出现了是否该以同一论文授予双学位，如何考虑语言问题等非常困难的局面。例如，在一

定程度上，采取使东亚历史研究课程得到国际上的认可的方式开展一些研究项目。再比如现代中国研究课程，它完全可以应用到经济领域等。如果到了课程的最后阶段，可进行某种程度的面试，以确认学生所掌握的知识情况。我认为，大学方面藉此便可将这种形式的课程设定在学生的课程之中。是否记入学分则另当别论。

川岛：或许 ASNET（东京大学日本亚洲研究教育网络）可以实施吧。如果与 ASNET 联合起来，使之纳入 ASNET 的课程之中，便能够取得学分。我们则以东大为中心，使之与不同的大学的人相联。我们如此构想，从早稻田大学方面看，即便是早稻田大学的课程，如果能够让他们认为这事实上只不过是在其他地方开展相同的工作而已的话，或许能够成行呀。假设东大有 10 次讲义，其中 3 次由东大的老师讲解，其余 7 次也可聘用客座教师任课，讲义可采用简短的集锦方式，这或许能够实现。只是存在着如何在不同大学授课的问题。

毛里：是呀。如果各大学都强调哪些是自己大学的资产，就会很麻烦了。

川岛：的确如此。如果对方是主权国家，强调的是哪是自己的领土，将会引起一场大的混乱呀（笑）。

毛里：是的。要讲隶属于谁的问题，下一批不是要搞“全球 COE”而是要搞“宇宙 COE”，将会是很棘手的。

川岛：应该更强调类似入会地的做法吧。应该不要规定什么所有权。我倒是对为何会出现入会地很感兴趣呀（笑）。要搞成近代性的东西的话，则入会地就很难办了。

毛里：是呀。我想，这才是后现代呀。如果不这样做，日本将无前途可言。

川岛：我想是的。因为大家都在强调自己的财产。

毛里：东大最近总是竭力主张“自己的财产”。这一主张不是很强烈的吗？

川岛：是呀。这也算是近代回归吧（笑）。

毛里：哈哈（笑）。所以，我想，如果首先从这里开放起来，出现了彻底开放的局面，这才不愧是东大呀。

川岛：是小宫山（宏）校长主义。

毛里：这是一种主义呀（笑）。还是要以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开展吧。比如说，英国的中国研究采用的是研究基地的方式，结果，英国的单一所大学无法承担。英国国内可以搞联合大学，如与 LSE 等共同创立中国研究基地。但是，存在着如何与美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开展合作问题，必须创建多重网络。据说这样的网络已经在建。因此，这与日本的有着很大方式上不同呀。日本属于一个较小的岛国，与其独立创建某些组织，不如从亚洲具有一些优越性的方面考虑，组办一些大学校际之间的交流或展览活动。我认为日本在这些方面还有可能成为核心。譬如，在亚洲的法制领域，名古屋大学正在不懈地努力着。如果早稻田大学、东大等主要大学也参与其中，说不定能够培养出法制界实干家型的博士来。何谓人权？把一些抱有这样想法的中国人不断接纳进来，并加以培养。这并非不可为之事，因为从这一意义上讲，日本拥有着较为先进的思想。



川岛：是呀。但大家仍然不能走到一起呀。预算到位后，常常用到狭小的地方，没有什么成果。

毛里：是的。还是有些难以想象呀。终归是要优先考虑组织利益的。

川岛：在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等方面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呀。所幸的是我一直没有把它当作回事，像英国的研究那样，虽然也用网络把世界上非洲与有关中国研究人员联系起来，但并没有认真地当回事，但大家还是有自己的范围疆土，经费也就自然按照每人的主权范围分配。我认为，在开展合作研究时，大家最好不要拘泥于自己的范围疆土，延伸到自己没有主权意识的领域，建立这样的网络才更加有意思。

毛里：再者，培养学生，让他们就业也有这方面的意识。想保护“疆土范围”，不断扩大势力的想法也与这一点有关，某大学在这方面尤其不遗余力。

川岛：这所大学很过分呀，因为太露骨了。

毛里：你们这代人应该迅速做出一些想法上的改变呀。

川岛：这所大学非常强势，这表现在给它如今在那里的各科学生们带来了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存在的前提下，我有心提出想法，但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由于他们将现代研究权益化，属于极端的现代主义，所以我将该校称作“国民国家”（笑）。

川岛：提到当代中国研究基地，我也知道一点成立经过。早稻田大学成为中心是由于 COE 的关系吗？

## 提问 7

### 获得了

毛里：我想应该不是因为 COE 的关系。COE 与这一项目是分离的。对了，还是因为早稻田大学最为热心吧，我和园田（茂人）先生都决心开展起来呀。同时，也是因为做重点领域课题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网络。

川岛：爱知大学没有参与进来，是什么原因呢？

毛里：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是说当初曾给爱知大学做工作，希望能够加入进来，但有人认为爱知大学不是很热心。后来，东大曾对由哪儿作为中心的意见出现过多次变化。这个项目与 COE、科研费的很大区别在于它不是竞争型的，旨在用较少的预算建构全国的网络。

川岛：算是分配型吧。

毛里：这种方式是否有效还不知道。总之整体的“馅饼”非常之小。六个基地一年才一亿日元。用这点预算要建成分析这个飞速发展的、全球化的中国的现状，这是非常之难啊。很有必要集中于某一课题来做。川岛：关于当代中国研究基地如何开展研究，我还是不太清楚。现在要面临的是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利用这些经费进行研究，每一个基地都是如此，全体应如何运转都有些不清楚呀。即便如此，我想它还是会产生一种催化剂作用的吧。

毛里：是呀。至少早稻田大学是非常积极的，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发挥核心作用，努力推进。至于我，两年后要退休了，总代表的担子要交给下一代了。最近感觉到，当代中国研究在人才方面似乎已经陷入十分危机的状态。这里存在着职位很

質問 21  
今後の中国研究の方向をどう見るか。また、今後の中国研究に望むものは何か。

问题，总归年轻的优秀研究者十分缺乏。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埋头做微观研究，而很少有人提出大的假说或冒险。50、60年代的中国认识存在某点偏见。但是，在开展研究时，某种程度的偏见有时也会发挥正面影响。通过突破它或打破它就好了。当然永远处于偏见之中是不行的。我甚至想学问的起点本来就在偏见和价值观里，如果没有这些，社会科学又有什么意义？但现以说是脱价值、脱偏见的时代，所以它没有给年轻人以一种刺激研究积极性的内在的动力。虽然也加以解释和进行说明，但却不进行分析、社会科学性的剖析。再加上中国本身变成了普通国家，不再很有意思。

川岛：是啊，真是头疼的事。这如您所说的，中国自身虽然还有某种不普通的方面，但在很多方面的行为举止却变得很普通了。像西藏问题那样，棘手且不能放任不管的问题出现时，有时会出现一些出于本意的真心话，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其普通的部分在逐渐扩大，也有人认为其不普通的部分会不断出来。从长期看，共产党的体制只能逐渐宽松起来。如果中国经济将以目前的态势发展下去的话，总会达到极限的吧。如此看来，这将为其带来结构性变革，也许要花 20 年或 15 年，这个不清楚，但我隐约觉得将会发生在 2020 年前后。您认为会出现下一次结构变动吗？

毛里：不知这会从哪一方面出现呀。

川岛：当然，因为这是无法预测的。

毛里：让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康晓光（历史研究者？）这个人。他是在人大吗？

川岛：是在人大。

提问 16

如何看待

中国的应

毛里：康晓光被认为是康有为的孙子，在 1980、90 年代曾经热心地讨论过中国民主化的改革派、自由主义者。不知因何，他突然回到了传统中国，如今在从事一些复孔活动等。我在想，他们的价值观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一旦成为现代主义者，将不会轻易无法再回到传统方面呀。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大潮中看似成为现代主义者，但本质上近代主义没有扎根。否则，为何会如此轻易地回到传统方面呢？这到底是属于主流还是个别案例，真有些让人难解呀。

川岛：这虽然算不上是“中体西用”，但我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现代是实现了本质化还是仅为表现某些特征而显现出表面化。虽然不清楚毛泽东所愤恨的对象和所打破的体制究竟是什么，但我认为其中仍存在着表面化的东西。因此，当被问及本质时便很难解释清楚，觉得以日本人的思维是无法得出结论的，即认为属于科学现代化论。因此，无法纳入发展阶段论。

毛里：是呀。因此，对他们来说的学术研究与我们所想的学术是不一样的。我想那是超越体制不同的问题，在中国文化的底层，中国的文人与明治以来的日本知识人的情况、其作用与功能都有很大不同。

川岛：是一种社会习俗吧。

毛里：是的，是的。因此，从这一方面讲，会不断遇到“叛逆者”。从多方面看，经常会发生“连他也会这样”的感慨。在进行中国研究时，常常会有超乎想象的情况发生呀。

川岛：这就是所谓的“叛逆”的中国呀。方才，您曾谈到王缉思的情况。您与中国的研究者有着各种交流，在这 10 年间，他们的方向转变虽然不属于某种形式的“叛逆”，您一直在关注吗？

毛里：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所有的事物都发生变化，每个知识分子也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否可以说是“叛逆”，其标准之一是，看他们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者。举国民国家的例子看，彻底地贯彻国民国家的理念是非常难的。但作为近代主义者，在理解近代国家所带来的矛盾与问题基础之上，但还是认为没有更好的替代物，所以就推行它。虽然存在各种民主主义，但作为次善的东西，在当今时代还是应该加以维护的价值。我想这种从相对意义上来理解价值的才是近代主义者。在我所接触的范围，在当今中国很少有那样的人。在谈论中国或近代史时，他们会轻易回到传统上，而我则不想那样。

川岛：我也是这样认为。

毛里：要想逃避，那总是可以逃避的，但没有任何意义。

川岛：这解释不了什么呀。

毛里：是呀，什么也解释不了。因此，至今为止我总是尽量不去碰触政治文化。

对白鲁恂 (Lucien W. Pye) 也持批判态度。但最近有时也想应该重新思考这个

#### 提问 14

是否与中国学术界

及其他文

问题。川岛：或许是将无法解释的问题归结为政治文化吧。我认为，在各种光线照射下，那些没有被照射到的部分便被称作政治文化，所以说，那些地方存在着“冗言同义反复空间”。所谓的政治文化，概而言之，就是概念模糊的部分和冗言。

毛里：大概是在 3 年前吧，不是有个中央党校吗？在北京召开了由他们主办的研讨会。这一研讨会所讨论的内容是政治文化与中国外交。我想，大概不会是广义上的外交，而是中国外交吧。所以，不知是出于执拗还是情绪不佳，当时我提出了“以政治文化讨论外交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的论点。这样一来，我的论点便几乎无人能够理解。傅高义（Ezra F. Vogel）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他这个人嘛，很大程度上具有中国情节，还算可以吧（笑）。于是，当我提出这一论点后，他便说“毛里教授，你谈得多了些，有点儿过分了吧”（笑）。我听他这样说，觉得他是想中止我的发言。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他正在着手筹建一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他认为美国式国际政治理论只属于美国。

#### 提问 11

#### 与国外的

#### 中国研究

川岛：南京方面有人开展这一研究，COE 没有入选。南京的国际关系者向 COE 提出了国际政治中的中国式理论研究的申请。

毛里：想建立中国学派可以理解，但不慎重看待则很危险。我在想，为什么美国式国际关系理论有些是通用的，有些则不通用。如果忽略这一点，简单就附和与中国学派的话，就会走向强调朝贡体制和道德文化。可是，日本没有提出类似“应该创立日本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张的研究着，相比之下，倒有些羡慕中国，这也是事实。

川岛：因为日本没有进入制定国际标准的“拔河”比赛呀（笑）。

毛里：完全没有进入呀（笑）。

川岛：中国当然希望能够参与这些国际标准的制定，那些有利于中国的理论在得不到其他国家认可的情况下，是无法成为标准的。其实原本标准是可以复数存在

的。

毛里：但那只是劲头啊。

川岛：这种想法是能够理解的，也理解他们提出的主张。我所关心的则是将会提出哪些理论呢（笑）。

毛里：但我认为，这种干劲儿非常重要，日本也应该想一想呀。

川岛：在北海道大学的欧洲研究者中有一位远藤乾，他出版了一部有关全球管理方面的书，其中有关于东亚的论述。他将国际标准的形成、城山英明先生所研究的国际行政机构问题、国际公共财学科的形成以及卫生、华侨的情况等进行了综合论述，并汇集成册出版。虽然由于出现了这种尝试，或许可以称之为日本模式或东亚模式的各种理论，但我一直在思考这种情况能否出现的问题。

毛里：尽管如此，我也认为是件好事，一说亚洲模式就只是任由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阿查亚（Amitav Acharya）来评说，这并不好。真希望日本方面也出现这样的思考。

川岛：接下来，我想就遗漏的问题请教您。在前半部分，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提问 9 和 10 的部分里，您详尽地回答了有关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的发展问题，并谈到与海外的中国研究人员的接触情况。关于所受到的欧美社会科学及思想、欧美中国研究的影响，您在前面也有所谈及，但不知您对此是否想做一些补充？

提问 12  
在哪些方面  
受到了欧美

毛里：好的。从事中国研究，尤其是从事现代中国研究时，正

如我曾多次提及的那样，我认为不能缺少**学科修养**(ディシプリン discipline)，这并不是什么手法之类的问题。从基本概念而言，学科的修养非常重要。总之，我们需要弄清自己所从事的中国研究有何效果，解析哪些内容，属于哪些范围等。在这一前提下开展研究时，具有学科的修养非常关键，无论哪一领域，文化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罢，我都深切地感到了它的重要性。但像美国式的对学科修养的要求，据说如果没有在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或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便不会被认作是学者。我认为这种做法有些过头。我认为，作为区域研究之一的现代中国研究应该有其立足点，中国研究能够将如此丰富的内容还原给社会科学。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我还是从西方的研究中受益匪浅呀。我虽然没有学习过东洋史，但认为它与自己迄今所学的一点点知识有着本质的不同，发现他们原来是如此分析事物的。下面举一个极端例子吧。市古先生嘛，非常难得，他是研究现代中国太平天国时期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学者，虽然在传统方面有所突破，但他对我们所从事的现代中国研究却持极强的批判态度。例如，1928年朱德、毛泽东退居井冈山时期，我们会就其意义进行分析，但他却不然，研究的是朱德、毛泽东的军队有多少人，是1000人、500人还是1500人，认为弄清这一点至关重要。然后便是使用何种武器问题，并表示为调查这些情况，即便耗费一生的时间也在所不惜。我曾说过，自己绝不会去协助做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根本不可能调查清楚。因此，在现代研究领域，我们只能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包括哪些，不了解的情况是否属于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模式或是经验法则等条件，并应用这些条件加以论证。我认为，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对近现代史研究来说都很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讲，近代诸学问都有许多启蒙之处，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



赛尔登（Mark Selden）等人所带头的 1960、70 年代的现代中国研究真的成绩斐然。但在 90 年代以后，那种活力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也看不见了。川岛：那时开始出现现代化论和现代化论批判，进入了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

毛里：前面我曾谈到过林德贝克（John M. H. Lindbeck）的管理理论吧。他的理论对我启发很大。还有黎友安（Andrew J. Nathan）及另一位想不起姓名的学者以《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为主战场，关于中国政治变革为钟摆型的理论展开了多次辩论。我从中受益良多，认为这种研究非常有效。

川岛：是的。黎友安的历史学著作中也融入了人类学的缘故主义。我也曾受到过这一理论的影响。

毛里：是呀，他们重视各方面的试验。

川岛：他们很清闲呀。一旦采用了这种方法论，便会让人得出如此的印象呀。

毛里：这些都是必要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我在 60、70 年代受到了很大的教益。

川岛：您曾经长期访问过中国吗？

毛里：81 年至 83 年期间，曾因工作的关系，长期滞留中国。

川岛：其后呢？

毛里：没有，再没有过。

提问 15

有深交的

中国朋友、

川岛：我知道的，是您访问上海那次吧。第 15 问是提“您有无深交的中国朋友、亲戚”，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这一提问的意图（笑）。您不会有亲戚吧。

毛里：怎么会有呢。虽然曾有人想做我的干儿子（笑），这使我很为难呀（笑）。由于自己根本不想建立个人关系，所以才会被学生们称为地道的现代主义者呀。

川岛：经您这么一说，还真觉得您像是这样的人呀。很多中国人都希望能够成为干儿子呢。您经常前往台湾吗？

毛里：台湾嘛，说起来有些复杂。我曾一直在台湾生活过，因为父亲是台湾帝大的教师。所以，我对台湾有着一种莫名的情感，这应该说是来自亲身的体验吧。

川岛：您在台湾呆到几岁呢？

毛里：几岁呢？到 6、7 岁吧。

川岛：到战争结束？

毛里：哦，应该是（昭和）22 年前后回到日本的。

川岛：是 1947 年回国的呀。您还记得您父亲的名字及所属的系吗？

提问 18

研究经历

（包括课

毛里：我父亲的专业是应用化学，名叫加藤次郎。由于自己不愿被人说对台北大学留下了些什么，进而被人拉出来引人注目，所以不太跟台湾方面有什么瓜葛（笑）。我自己一直希望从周边研究中国，撰写过一部《从周边看中国》。我准备采用正统派的理论，从正面展开

研究。这也是性格使然。因此，我想对政治的根本、外交的根本等进行研究。关于少数民族以及人口移动等问题，虽然有很多人在从事这些方面的研究，但由于性格的原因，有些内容我并未涉及。因此，当《从周边看中国》一书中的边缘化

提问 19

曾参与过

现象只涉及西藏问题时，便遭到周围人的反对，被认为对北京情况一无所知呀（笑）。我想过为何不能研究周边问题呢，边缘化现象有什么不好呢？但大家都这么认为。其实边缘化现象也没什么不好，我就这样认为。日本的东洋学研究的是核心问题吧。所以，我也研究核心问题，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川岛：正如您所讲的那样，日本的东洋学与中国的学界争论得非常激烈呀，因为都是有关国家论、社会论等问题。

毛里：从现状看，我们这代人已经与传统的东洋学完全断绝了关系。我想这或许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仁井田（升）先生在战后曾一直从事过相关的研究，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可是我们并没有学习。比如，战后人们默许了内藤湖南，还有（白鸟）库吉这些战前的日本东洋学成了被否认的对象。虽然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也无可厚非，但值得反省的是，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努力继承下来。如今已悔之晚矣。

川岛：是否因为这些原因呢？在战后的某种环境下，战前的学者因曾配合战争而遭到批判，同时，某些马克思主义要素又缺乏说服力，因此，在这些前提下，发生了许多批判事件。对了，或许是因此而发生了断绝关系的问题。具有清朝考证学性质、出现于江户时代的汉学几近消亡。虽然听说在京大的某些学科还有所残存，但东大等则完全持否定态度。也有一些地方研究东洋史的同行之中仍然保留

着这种传统。

毛里：我认为，可以不应用这种传统，但应该使之成为客观分析的对象。比如说，曾发挥过怎样的政治作用等。换个话题吧，如根岸佶先生如今是否得到一定的评价？

川岛：他的行会研究还是无人超越呀（笑）。

毛里：如中国社会的那种行会在国际中国学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呀，是否有我们能够继承之处等。概而言之，作为一种客观的研究对象，或许真的需要某些机构认真地加以研究。不幸的是，不曾有过开展这种研究的环境呀。有从事这项研究的机构吗？

川岛：有从各方面回顾东洋史的书籍，那是大修馆出版的上下两卷本。最近，出现了汇编“帝国日本时期的学知”系列丛书等的一些积极动向，但只是最近才出现的。他们似乎不像是希望趁在世时有所作为，而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总之，他们的思想趋于后现代主义，涉及的内容包括帝国解体论、摆脱殖民地化，有着独自の论述方式。因此，他们并不从更深的学术方面对根岸派以及市村瓚次郎等进行论述。十分明显，这其中存在着问题，这应该不是学术继承的问题。

毛里：的确如此，是有所不同呀。末广昭先生做的是地区研究中的满铁问题，非常优秀。。但最重要的是，满铁的研究并没有作为学问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许已经做过许多常规调查，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此外，我还曾与竹内实先生在《世界》上进行过对谈。自己与竹内先生的思想完全不同啊。

川岛：意见不相投吧（笑）。

毛里：不相投。让竹内先生说，毛里是难解的现代主义者，近代主义者不会明白中国。。但很有意思，我们之间存在着非常深的沟壑。为什么沟壑会如此之深，这也许是应该追问的。

川岛：是啊，因为他经常会把对历史、学术方面的不满带到会议上。您说过，历史学家常常会是这样的，在最后的结论部分，不擅长转入“为何”的问题。总之，不是从经济学，而是从文学领域转入历史学的人尤其是这样，说明了现象就止笔了。。即使被问及“为何会是这样”时，也会回答说“由于没有资料，所以对此不明白”。资料中会不谈某些内容，或习惯不涉及相关内容，所以就那样了。

毛里：但一定要营造一种能够进行对话、切磋交流的场所，能够使历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相互琢磨的场所。

川岛：是呀，进一步走向“蜗壶型”的气氛非常浓厚啊。我想，这将会带来更多的困难吧。提问 20 是问“您最大的成果”和“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请您谈谈这两方面的情况吧。

毛里：遗憾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最大的成果，但遗憾的事情嘛，那便是还没写出《现代中国外交概论》啊。这都是因为 COE 的缘故（笑）。我目前正在努力写。我想，完成之后，应该能够展示出一种自己所设计的中国的地区研究的方法吧。

《从周边看中国》、《现代中国政治》与这部《现代中国外交概论》3 部著作将形成我的现代中国论。，不努力不行啊，这真是非常辛苦。关于中国外交研究，美国的“数量攻势”很厉害。而且，如今，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惊人

的数量。日本的研究从内容上不会输给美国和中国，但书的数量也好，研究者的数量也好，真是压倒性得多啊。

川岛：文献繁多，且资料庞杂，令人无法应对呀。仅涉及非洲问题的资料数量已然非常庞大，而且网上的资料也非常之多呀。

毛里：哦，真让人感到头痛啊。这到底该怎么办？

川岛：的确让人感到为难呀。既有商务部的各种信息，又有各地方的信息，还有涌入城市的农民在网络上发布的信息，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因此我认为，研究中非关系会困难重重啊。虽然可以只跟踪外交部的政策，但文献仍然过多。在这种状况下，真是举步维艰，简直无法开展现代研究呀（笑）。

毛里：嗯，现代研究真的很难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算作是一种冒险吧。也就是说，一个假说得不到完全的验证。但留着这个假说，提出一个观点，为说明这个观点，则用 3 个左右的实例进行分析。如果提出这样的观点，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见解。即便如此，我最近还是觉得，这也比那些什么都写在一起的论述要好一些。

川岛：彻底做好假设验证，并进行不断的积累。这样做虽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

毛里：是的。与那些把所有不同考量的动向都写在一起的研究相比，或许这更有意义。

川岛：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观察事物，并做出一些可行性的分析吧。

毛里：是的。“中国已经变得非常棘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铁摩尔说的话，这一表述正表达了我此时的心情。

（完）